中国新一轮镇压

中国二0一一年新闻自由



国际记者联会
Residence Palace, Bloc C
155 Rue de la Loi
B-1040 Brussels, Belgium
Tel: +32 2 235 22 00
Fax: +32 2 235 22 19
Email: ifj@ifj.org
http://www.ifj.org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分会
245 Chalmers Street
Redfern NSW 2016, Australia
Tel: +61 2 9333 0999
Fax: +61 2 9333 0933
Email: ifj@ifj-asia.org
http://asiapacific.ifj.org

本报告之部份经费，由澳洲及纽西兰媒体、娱乐与艺术联会属下安全及团结基金会赞助。

Author •撰稿 **:** Serenade Woo

Editors •编辑 **:** Kathryn Bice, Josh Bird

特别鸣谢：驻华外国记者协会
香港记者协会
香港外国记者协会

部份图片提供： 路透社、明报、自由亚洲电台、新唐人电视台、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记者及网民。

封面图片说明： 中国出现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记者在北京采访抗议活动时被公安粗暴阻止拍摄。

内容

前言	页 2
引言	页 3
中国大陆	页 5
2011：大陆新闻界失去的一年 ——余炎奇	页 2 6
茉莉花开之后 ———柯以	页 2 8
外国记者在中国	页 3 0
香港新闻势危	页 3 6
新闻自由已不再自由？——程淑贤	页 5 1
中国网络	页 5 3
建议	页 5 6

前言

国际记者联会于二零零八年初就中国北京八月举办奥运，开展了一项监察中国境内新闻自由及侵犯新闻自由的项目，随之亦撰写了题为《奥运在中国的挑战》的年报。年报中，回顾二零零八年整体新闻界的状况，纵使当中不乏侵犯新闻工作者采访权及践踏新闻自由的事例，但是，在接近年末之时仍目睹中国有往前走的意向，纵使步伐缓慢，但仍朝着更开放，安全及保障境内外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环境。

虽然北京奥运的火距已熄灭，国际间关注的焦点已放缓，但是，国际记者联会仍决意继续在二零零九及二０一０年仍监察中国新闻自由的状况。这数年间的年报，乃自二００八年起搜集而得的数据，进行陈述及分析而得。年报中，集中交待中国境内包括香港及澳门的新闻工作者遇上的挑战。不幸地，相关的消息都并非令人感到雀跃兴奋，我们目睹的是中国官方持续地不断下达禁令，限制新闻工作者及媒体机构报导新闻的内容。

除了勾勒海内外记者的工作情况外，在二０一一年的年报中揭示，随着二月份中东茉莉花革命的浪潮传送到中国后，记者在中国采访的环境更恶劣，不少记者被辞退或被迫离职。

在中国茉莉花革命浪潮中，众多新闻工作者、律师、博客及维权人士遭官方褫夺食物及休息的权利，众多海内外记者更被打、滋扰或被杀。互联网仍旧是政府镇压的目标。一个全新监管互联网的部门更正式成立了。外国记者的工作签证被拖延更成为官方利用的手段向记者进行威胁使其就范。

另边厢，香港与澳门的媒体同样经验到新闻自由收缩的处境。在二０一一年间，至少五名香港记者被香港警方以各种的计谋指控。澳门的媒体同样面对沉重的挑战，迎接澳门政府建议成立一个新闻评议会。

二０一一年，中国的媒体处于「冰河期」！

是次监察新闻自由的报告，承蒙本会获得海内外朋友的联系得以完成，当中不少人士的名字本会必须姑隐其名。

国际记者联会亚太区
二零一二年一月

引言

自二００八年北京奧運結束後，中國媒體受到的限制急速增長，眾多中國籍記者被迫辭職、停職、因同事的「犯錯」而被懲罰，甚至被殺。

中國大陸記者的個人安全一直被受關注。國際記者聯會九月公布，調查報道記者李翔在河南省洛陽調查採訪一宗社會罪行，期間被殺兼失掉手提電腦，當地公安迅速調查並將案件定性為搶劫案，不過，李的同事對有關說法抱有質疑。另外，一名女記者在北京朝陽區工作的電視台外，被人重創臉部。

另方面，本會亦發現不少個案涉及官方誤用現有法例如國家安全法來威嚇記者。九月，記者許紀光在河南洛陽市調查當地一名公職人員拐擄婦女後，禁錮她們做性奴。記者調查時遭當地公安指控洩露國家秘密。

過去一年，至少十六名記者更被迫離開原有的工作崗位，當中包括張平（又名長平）、王克勤、陳敏、宋志標、李文凱、鄧志新、龍燦、李建軍及石玉等。他們有不少人都是在同一所媒體同一組別工作，尤其是《南方都市報》的評論版。

不少記者更是專做調查報道如《中國經濟時報》工作的王克勤便與約五名同組記者被迫離開報社。李建軍更為同事龍燦遭官方無理投訴而被總編輯貿然辭退，表達不滿，自己之後亦被撤職。

數份以調查報道為主的雜誌，被官方以原因「眾所周知」被迫關閉。國際記者聯會強烈質疑中國中央政府及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在上述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踏入二０一一年起，國際記者聯會便獲悉中宣部向媒體下達至少十項指令。這些指令中，有部份指令，媒體全面執行完全沒有報道，如二月發生的「中國茉莉花革命」事件。不過，本會亦觀察到眾多記者極盡努力報道公眾關注的事情如溫州動車相撞事件，他們爭取機會報道直至中宣部發出禁令為止。

二０一一年，國際記者聯會如過去一樣繼續監察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並將獲悉的官方禁令在年報中公布，不過，中宣部及省宣部是年開始更變禁令傳遞的做法，不用文字改用口頭傳遞，並著媒體不能用文字紀錄。有關做法的更變引證，中宣部或相關部門深明有關的禁令或指令均違反新聞自由。

不過，國際記者聯會非常歡迎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對本會六月二十日發出聲明後作出的回應，確認政府不准許各級政府部門或機構建立「記者黑名單」的制度。本會在聲明中對中國衛生部有官員指定立「記者黑名單」深表關注。

本會雖然目睹新聞出版總署配合國際間的標準，但是，本會仍知悉眾多政府政策局、部門及個別的政府人員並沒有全面履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及總理溫家寶在中國共產黨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指示說明，所有政府人員須推進政務，保障人民的知情權、監督權、參與權及表達權。再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於二０一０年就《政府信息公開法》的推行狀況，於境內向全國各級政府部門進行調查，發現只有兩個政府部門符合要求。

媒體在二０一一年可謂處於「冰河期」，中央政府火速收緊媒體的空間，民間社會亦同樣感受到這股寒流。

隨著中東及北非茉莉花革命向外擴散後，這股風暴迅速蔓延至中國境內，眾多人包括記者、博客、維權律師、維權人士及維權藝術家都被非法拘留、起訴、懲罰甚至虐待。

本會更獲悉中國南部的廣東省公安局擬定了一紙「記者黑名單」，名單上的部份記者已先後被迫離開原有的工作崗位或中國。

正當中國的新聞自由狀況緊縮之際，特別行政區的香港亦非完全享有新聞自由。踏入二０一一年，國際記者聯會便錄得每涉及政治議題時，香港警方便不斷收窄人民的表達自由及集會自由權利。

下半年，香港記者更經驗到自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由英國回歸到中國大陸後，最嚴峻的限制，至少有五名記者被香港警方在沒有確實證據證明牴觸香港法律下，拘留多時，電視台蔡姓實習記者更一度被香港警方以阻街罪指控。

八月中，中國副總理李克強官式訪港時，香港警方以身軀及手兼在保安員的協助下，阻撓記者執行採訪工作。一名便衣的探員更用手撥向電視台攝影機，圖阻止攝影師攝錄李克強進入一座私人屋苑的情景。當香港警務處處長曾偉雄被要求解釋該名探員的行為時，他謂「警員見到一個黑影的本能反應」。

在連串侵犯新聞自由事件發生後，本會屬會香港記者協會及香港攝影記者協會組織抗議遊行，表達憤怒，約三百名記者及香港市民參與支持。另方面，本會亦錄得香港媒體業內亦發生數宗威脅新聞自由的事件。

本會一如概往目睹侵犯新聞自由的事件後，先後致公開信函予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中國總理溫家寶、中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委員、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香港特別行政局保安局局長及多名香港立法會議員，表達本會對香港區內新聞自由的關注。本會及香港記者協會的代表亦被邀出席香港立法會特別委員會陳述關注。

至於外國記者在中國境內的工作環境狀況，自二００八年奧運後，有不斷轉差的跡象。一名記者在內蒙古採訪連串示威遊行事件發生時，在入住的酒店裏深夜被公安喚醒。此外，眾多記者在採訪「中國茉莉花革命」示威時，更先後被公安或身份不明的人士滋擾、扣留、粗暴對待甚至毆打。一名記者在山東省採訪失明維權人士陳光誠時，更遭暴徒粗暴對待、滋擾甚至拋擲石頭襲擊。

互聯網方面，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更成立一個專門監察互聯網的互聯辦信息辦公室，該部組由多名政府重要官員組成分別有中宣部副部長兼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王晨、公安部副部長張新楓等。自有關部門成立後，超過六千個網站被指「非法」而勒令關閉。

隨著中國大陸、香港及台灣的領導層在二０一二年陸續更替，國際記者聯會促請中國國家新任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香港特別行政區首長及台灣總統能公開地承諾捍衛新聞自由及表達自由。與此同時，所有新任領導層要求所有下屬官員全面執行公開資訊指引，並進行立法，以體現國際人權公約、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及香港《基本法》第三章第廿七條中，述明保障新聞自由的權利。

中国大陆篇

中国媒体踏入二０一一年，经历到自二００八年以来最严峻的打压，迅速使中国媒体陷入「冰河期」，可是，急速紧缩限制媒体采访的原因仍是未见清晰。不过，个中原因有可能跟中东及北非茉莉花革命，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于二０一二年进行人士更替有关。二０一二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九名委员中，将有多人退休改由他人接替，因此，一如过往，中国领导层在这交接期都甚为紧张，确保社会稳定。

「茉莉花革命」致镇压媒体

二０一一年，中国媒体有限的新闻采访再进一步受到侵蚀，中国官方更针对撤除及限制一些敢言的记者。

多名在北京及广州工作的记者都先后被迫离开原有的工作岗位，其中一人更要离开中国。此外，政府且拟订了一纸「记者黑名单」向一些敢言的记者施加压力。中央又进一步收缩具有影响力的都市报，限制卫星电视台播放节目及建立新监管互联网的政府部门。

随着中东及北非茉莉花革命火速传送到中国后，国际记者联会录得多名新闻记者、公民记者、作家、艺术家及律师被公安部的国内安全保卫警察及其代理短期非法拘留、滋扰及虐待。虽然，这些人士最终获得释放，但是，他们仍受到家居监视或被起诉。

对于中国媒体在巨大压力下，努力争取报道八月份温州发生的动车相撞事件，并对甘冒官方惩处，遭官方下令禁止报道的相关报道上载到互联网，本会致以崇高的赞赏。

二０一一年二月十九日即「中国茉莉花革命」发生的前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北京的党校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现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又处于社会矛盾突显期」，因此，政府需落力控制互联网的信息传递，达致「进一步加强和完善信息网络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健全网上舆论引导机制。」

虽然，胡锦涛的发言恰巧碰上「中国茉莉花革命」出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似早已有所准备，一月五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北京与所有宣传部部长进行会议，另一名委员兼中宣部部长的刘云山先后发表演词指「把思想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

媒体禁令持续

随着宣传部部长会议后，《法新社》中文广播驻上海记者曹国星报道指，中宣部下达十项指令限制媒体采访报道，当中包括严格限制报道灾难、意外及突发性事件，倘有重大事故发生时，记者只能报道官方信息，不能加插其它非中国境内官方的消息来源。当有群体事件发生时，只准中央及地方媒体报道采访，不论是政府或党媒。加强都市报的管理。至于贪腐个案的报道，指令称不能有评论、辩论或质疑政治改革。记者并要停用「公民社会」这词汇，完全禁止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或利用媒体替代或影响公众的意见。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记者对本会表示，他并不质疑《法新社》的报道内容，因为中宣部经年累月不断下达众多禁制令或指令。不过，中宣部及相关的部门在二０一一年下达的指令，已由文字纪录改为口头传送，并要求所有媒体不得用文字纪录。

该名记者谓：「宣传部做法的改变可能同一些媒体组织，尤其是你们的组织（国际记者联会）在过去几年的年报中刊登部门下达的禁令有关，导致他们另想办法。」

国际记者联会由二００八年到二０一０年间均刊载宣传部下达的禁令，这些禁令包括二００九年在韶关及新疆发生的种族仇杀骚乱事件，及二０一０年八月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泥石流事件，官方下令所有媒体只能采用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二０一０年八月广东「撑粤语」示威游行事件，媒体更被勒令禁报。

本会虽然未能确认二０一一年下达十项指令的真伪，但是，本会基于中国政府过去对媒体限制的纪录及范围，相信有关指令的存在。与此同时，政府控制媒体更成为首项工作。一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跟宣传部部长及政法委召开会议后，据《新华社》一月十三日报道指，政府提醒各政府人员需透过传统或互联网媒体主导社会舆论。

群体事件

据《中国日报》二０一一年五月四日报道指，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成立互联办信息办公室。办公室成立的目标是加强政府内各个与互联网有关连的部门及机构的整合，从中协调改善工作。新的部门设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内，而新的办公室主任是中宣部副部长兼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则出任副主任。

在上述环境下，不少群体事件发生后却鲜于被媒体报道。首当其冲重要的群体事件于二月二十日分别在北京、上海及广州发生，可是，所有媒体包括互联网都没有报道，只有《人民日报》的姐妹网络版《环球时报》英语版简单报道。

即使非群体事件的事情亦难于可不受限制报道，当中包括云南省盈江县三月十日发生五点四级地震，导致廿六人死亡及三百一十三人受伤的灾难、南京栖霞区五月十二及十三日发生工人维权示威，省宣传部禁止报道，甚至日本三月十一日发生的海啸及核电厂意外，中宣部亦下令所有媒体不能把刚在云南发生的地震事件进行比较报道，而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亦未有给予任何解释，命令所有电子媒体不能进行实时现场广播。

据《阿波罗》网站报道指，华辉电视制造有限公司突然关闭，雇员未获赔偿致逾千人在厂房外示威事件，多名示威者更遭公安拘捕，但



即使非群体事件的事情亦难于可不受限制报道，当中包括云南省盈江县三月十日发生五点四级地震，导致廿六人死亡及三百一十三人受伤的灾难、南京栖霞区五月十二及十三日发生工人维权示威，省宣传部禁止报道，甚至日本三月十一日发生的海啸及核电厂意外（图），中宣部亦下令所有媒体不能把刚在云南发生的地震事件进行比较报道，而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亦未有给予任何解释，命令所有电子媒体不能进行实时现场广播。（图）

是，事件未获境内媒体报道。五月廿三日，内蒙古自治区一名位于南部的维权牧民被杀后，引发连日大型示威事件，有关事情在报纸、电子及互联网内全被封锁报道。在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政府三幢大楼连环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三死包括涉嫌引发意外嫌疑人钱明奇在内，中宣部亦下达指令只准媒体引用官方《新华社》的报道。据香港电视台《有线电视》报道指，钱明奇是一名农民，因不满地方政府强行收地却未有给予足够赔偿，因而促发是次事件。



娱乐

二０一一年，正是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纪念，一出名为《建党伟业》的电影正为庆祝共产党的成立在七月时便开始在戏院上演，但是，该部电影的评论却同样受到中宣部的限制，任何负面的评论都不得刊登。

十月廿六日，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出一项指令，所有卫星电视台在二０一二年起，必须减少播放娱乐节目，改为播放建立道德及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节目。指令的出现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在十月十八日，指纳了一个宣传中国「软实力」及确保「民族文化」的建议后作出的决定。在中共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决议采纳一个专项小组的建议，改革中国文化系统以提升中国人民自我身份认同及中国文化的肯定，同时，鼓励媒体包括互联网多宣传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



广东省乌坎村村民（上图）连日举行和平示威及村民封村阻公安进入后，引发海外传媒极度关注，赶赴采访，惹起不远处海门镇村民（下图）也因不满当地政府违法，容许发电厂再建而抗议示威，终引起大量公安包围发放催泪弹驱散民众。（图片由《明报》提供）

中央经常使用「文化传承」。二００九年四月，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同样发出类似的指令，禁止所有电子媒体广播综艺及谈论社会上流人士丑闻或婚外情等清谈节目。不过，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在今年发出的指令只针对卫星电视台，国营的电视如中央电视台则未包括其中。重庆政府更早于四月时率先限制该区的电视台播影娱乐节目。

一名在大学教授媒体的大陆教授说：「我觉得这个做法只会提供贪污机会，无人会严格遵守有关规则，尤其是较偏远的省市。中国大陆有太多潜规则，电视媒体人可藉用这些契机向商界讨利益。」

中国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更进一步限制电视运作。十一月廿八日，总局称为了大众利益故发出指令，着电视台由二０一二年起播放戏剧时不能插播广告干扰连续性。

不少评论指，有关指令影响媒体的生存空间，因为广告费是电视台的主要收入来源。同时间，广告可能会转化另一种模式在电视中出现，届时只会制造另一种贪污的空间。

公众利益及安全事件禁报

由于中国政府众多部门都会向媒体施加禁制，引致普罗市民很难摘取或获知会众多重要关符公众安全事件，当中最鲜明的例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七月份发生斩杀事件，十名人士死亡。不过，公众却难以知悉事件的源由。据新疆政府控制的一个网站《天山网》在七月三十及三十一日报道指，喀什市连续两天发生爆炸事件，有十人死亡当中包括八人被公安开枪射杀；三十一日，四人被人用刀斩死，公安随后开枪将五名疑犯击毙。八月一日，《新华社》报道指，公安击毙两名恐怖分子。虽然，官方控制的媒体报道有关事件，但是，报道未有平衡报道，引致公众难于明白死亡事件的始末。

事实上，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国政府有责任将信息尽快向公众公开，各级政府包括政策局、部门都要向人民负责任。不幸的是，有关条例的推行极为差劣。根据社会科学院二０一０年公布了有关条例，在二００九年至一０年间的执行情况，调查发现在四十三个局、部门或机构中，只有两个部门表现较为理想。执行有关条例最差劣的省市包括山东、甘肃、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及内蒙古自治区。五个执行条例较好的地区分别是北京、广东、上海、天津及山西。

社科院更建议中央政府及各级政府都要加强公开信息意识，各级政府政策局、部门或机构更要全面执行有关条例。

国际记者联会全力支持社科院的建议，此外，本会更相信这是媒体的基本权利使媒体能把公众关注的信息得以发放。不过，社科院的报告公布后，情况并未见在二０一一年间有很大的改善。根据《北京时报》八月十五日的报道指，北京最高人民法院考虑是否容许法院就一些个案如政府发布错误个人信息等，进行司法复核。

设立记者「黑名单」

监管新闻工作者行为的「黑名单」制度终设立了。据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六月八日的官方网站公布，有关「黑名单」的制度已于五月十七日订立。有关制度订立了九项指引当中包括记者若涉及敲诈、索取利益或不诚实获取记者证，该名记者会被禁止工作三至五年，甚至会被禁止再从事媒体业。国际记者联会认同新闻工作者敲诈或索取利益须予以譴责，但是，本会忧虑现时中国政府众多部门并未依从条例公开所有信息，记者的报道便因此而被指失实承受惩处。

温州动车相撞

二０一一年间，敢于报道新闻的媒体承受不少压力。九月二日，中宣部突然间下令北京两份较著名的报纸《新京报》及《京华时报》改为北京省宣传部管辖。《新京报》原是由南方报业及光明日报报业联营。两报分别在北京及广东省出售均受中国共产党控制。至于《京华时报》的杂志《京华周刊》则归为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人民日报》主管。新安排后，编采部更改采访方针，引起员工投诉，五名雇员已先后辞职。至十一月初，杂志新主管层更恫吓杂志职工指，他们可选择离开或转往《京华时报》工作。据多份中国媒体报道指，新闻出版总署同意媒体安排的更变，以配合更有效推出中央政策。不过，有大陆记者对本会谓，众多记者相信两份报章主管部门的更变是一项报复行动，因为两份报章在温州动车相撞事件中均有显注报道。两份报章现只限于采访北京区内新闻。

温州动车相撞事件，是另一显注事例证明中宣部的决定偏离民意。七月廿三日，中国首次制造的高速火车发生相撞意外，意外发生在浙江省温州市，两部高速火车前后相撞，据当地政府公布指意外酿成四十人死亡，一百九十二人受伤。

据媒体报道，意外后政府人员迅速处理现场，除拯救伤者外，更火速把车厢的残骸埋进地下及阻止媒体调查采访讯号系统问题。



二0一一年七月廿三日，温州发生两列动车相撞，当地政府报称有四十人死，一百九十二人受伤，不过，中宣部仍努力控制传媒报道。（图片由《明报》提供）

七月廿三日，两首火车相撞后，中国铁道部官员在酒店只准两所官媒包括中央电视台访问，拒絶本地及海外媒体的采访要求。翌日，铁道部安排记者会交待事件但只用了半句钟通知媒体。记者投诉铁道部发言王勇平并未有响应提问，特别是当记者多番质疑铁道部立即将火车残骸埋在地底，意图隐瞒导致相撞原因时，王勇平重复地解释做法是为了方便拯救工作，更说：「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不过，广东省宣传部利用记者会的登记名单，要求在现场采访的六间媒体记者撤离，六所媒体分别是《羊城晚报》、《信息时报》、《广州商报》、《21世纪经济报导》、《广州日报》和《南方电视台》。

中宣部且要求所有媒体包括其官方网站正面报道有关事件，不准评论或做深度调查报道，只准许《新华社》及《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采访铁道部官员，其余一概不准。即使中央向媒体打压，记者仍旧报道有关事件并进行评论，可是，情况至七月廿九日即中国传统纪念逝者的「头七」，中宣部下令所有媒体撤回所有温州动车相撞报道，媒体再测试底线的做法立时停止。

一名大陆记者对本会谓：「他们非常害怕。我们当晚已收到省宣传部的指示，我们仍未决定找那一篇稿替代原本温州动车相撞的文章，中宣部已急不及待再致电报社叫停。」

由于禁令的下达，上海东方卫视电视台现场直播温州民众如何悼念死者的讯号亦被突然中断。由于所有报纸媒体都必须遵守有关禁令，因此如《中国经营报》八版的报道全部被撤，《21世纪经济报导》十二版的报道全被撤销，而《新京报》的九版报道亦是同一命运。一名记者对本会指，媒体虽然不能直接报道，但是，他们事后却用非直接的手法传递信息，《新京报》以「连续七天下雨」天气报告替代原本写有「我们还生存」的标题。

多名记者亦因温州动车相撞而被惩处。七月廿七日，中央电视台的《廿四小时》节目监制

王青雷被停职，因为节目在七月廿六日当天，主持人质疑铁道部关心铁道发展多于人民生命安全及质疑铁道部在意外后的处理手法。而另一节目《新闻1＋1》在七月廿五日的广播中批评铁道部发言人的发言后，翌日亦突然间在没有向公众作出任何解释下暂停广播。

一名记者说：「在中国维稳是首要任务，任何引起民众长连累月的情绪或愤怒都必须要立即制止。」

记者被强迫离职

中国中央虽然在过去力图改变中国媒体的形象，但是，控制媒体成为喉舌仍是核心工作，故良久以来被受批评。随着社会变化，中央亦转变说法改为「舆论引导」并列为媒体首项工作。八月十五日，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在中共《求是》杂志中便重复述说有关论述。文中更清楚说明，媒体若不遵守有关原则，他们个人或是整个媒体会受惩处。

二0一一年，位于广州的《南方都市报》的评论版职工便承受重大压力，他们分别被迫离职或移致其它岗位。中宣部副部长等人在年初前赴南方报业集团探访后，一月廿七日，年约四十的张平（笔名长平）便是首位受到打压，被迫离开岗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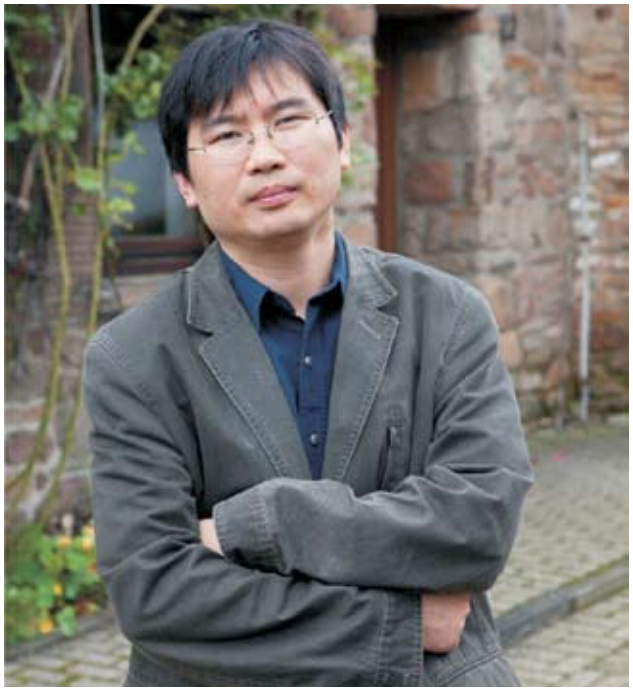


七月廿九日，中宣部下达紧急强硬指令，导致众多已准备了多版报道事件的传媒被迫抽掉版面。不过，这些传媒仍把有关报道上载到网络向外披露中宣部向传媒施压。（图片由博客提供）

张平原本在《南方周末》及《南方都市报》有一专栏撰文，但是在二0一0年七月起，集团在没有清晰解释下停止其专栏。张与集团管理层一月廿七日会面中，被上司要求停止撰写评论文章，不过，遭张拒絶。期后，管理层决定不再跟张续约。

张平对本会谓：「当他们跟我终止合约时，有管理层承认他们受到很大压力要求我离开。」

同样是评论版的主管陈敏（知名博客，笔名笑蜀）及李文凯都被迫离职或离开原有岗位。另外二人分别是编辑邓志新及评论员宋志标则因



中国记者张平（笔名长平）踏入二０一一年便率先成为中宣部打压的目标，引致掉失工作之余，最终更要被迫离境前赴德国参与写作项目。（图片由张平提供）

二００八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三周年当天，撰写及刊登一篇悼念文章引起涟漪，因为文中纪录了维权艺术家艾未未追踪地震惨剧后的悼念作品。艾未未的名字在该时段已成为媒体的敏感词，除了《人民日报》的姐妹网站《环球时报》的英语版外，没有媒体敢于刊登他的名字，因为艾未未四月初突然被中央拘捕。他虽然事后被官方控以逃税，但他被捕的时间刚巧是二月份「中国茉莉花革命」发生后出现。

一名不愿披露名字的记者说：「记者被迫离开岗位都是在中宣部高层、新闻出版总署及全国记者协会要员探访编采部后发生。」

自二００一年，张平已两度被降职。首次降职是发生在二００一年，当年他就一些社会议题撰文评论；第二次是二００八年西藏骚乱事件发生后，他因撰文评论爱国主义而再遭降职，被转职为集团的研究员。张平现于德国。《南方都市报》在中国南部媒体界甚具影响力，评论版更取得公众好评。

二０一一年调查记者及知名评论员成为狙击对象

七月十八日，《中国经济时报》突通知报社进行改革，以经济新闻为主导，故调查组将会撤消，著名调查组记者王克勤及其同队记者全被要求停止职务，而总编辑张剑荆亦接获通知停止职务。据悉，张被停止职务相信与其支持调查组记者王克勤持续进行调查报道有关。张事后更被调致国务院下发展研究中心出任《中国经济年鉴》总编辑，但是，张未几辞职转往财新媒体集团。王克勤则转往《经济观察报》任职。

王克勤过去曾进行多起影响深远的调查性报道，其中包括三月份报道约百名小童死伤的山西毒疫苗事件，及二００五年报道河南省因卫生设施恶劣，公众因输血致感染艾滋病事件。

《成都商报》总编辑及另外六名编采部职工在二０一０年十二月，因一篇报道黄山多名青年迷路及救援人员堕崖亡事件，分别被罚款及撤职。事源十二月十二日，资深记者龙灿报道十八名年青人在安徽黄山上迷路，一名青年曾三度试图致电当区公安局求助，但电话一直未能接通。其中一名青年遂发短讯予上海一名有影响力的亲戚，上海及安徽两地公安于是赶往现场拯救。报道指，其中一名救援人员堕山，但十八名青年则全部获救。当报道发布后，上海公安发出声明否认受到安徽公安打压配合拯救工作。龙灿事后在未获报社给予解释下被辞退，其余六人包括报社编总辑陈舒平、编辑张丰及值班编委被罚款一千至三千人民币不等（约美金一百五十至四百五十元），其余的编辑则被批评、停职及撤职。

龙灿的同事李建军目睹报社的做法感到不满，期后，致函予报社总编辑就辞退龙的事作出



二０一一年，调查记者成为针对目标。中国著名资深调查记者王克勤与其团队便成为目标对象，被迫离开原有岗位。

质询，并提问报社是否该盲目跟从中宣部的指示。不过，二月十八日李建军被辞退。

《华商晨报》两名高层二月十九突接获报社通知，指二人因春节前夕报道了一所五星级酒店大火、及朝鲜半岛事宜而被惩处。总编辑许丽被警告而副总编王晓昱则被免职。沈阳市宣传部门指二人违反规定，于春节前夕即二月三日报道了五星级大酒店皇朝万鑫酒店大火，此外，又指二人去年十一月报道朝鲜半岛向南韩发炮的新闻时，刊载了一名专家的意见，引致朝鲜半岛政府不满向中方投诉。可是，省宣传部并没有具体交待二人违反那则规定。

双周刊杂志《南风窗》采编中心主任赵灵敏八月三日刊登支持多党制的专访文章后，十五日，她突接获停职通知。她在其个人博客中谓，编委会未有清晰给予解释原因，但是却指她犯上了政治导向错误。杂志社长陈中亦同样被罚。陈因为出任杂志的最终负责人而被免职。《南风窗》是广州媒体集团旗下刊物，一九八四年获广州党委准许出版成为《广州日报》的姐妹杂志。

惩罚除了针对个人，亦会针对整个媒体，二０一一年十月八日，调查性杂志《长城月刊》在未获官方的解释原因下被迫停刊。据该杂志编采部九月廿八日在网上发布的公开信指，杂志的编采及市场部人员获告知「原因众所周知」而被迫停刊。杂志随后未有依惯常十五日出版，故十月十五日之后再未有新的杂志刊登。有媒体报道指，杂志被迫停刊是遭中央打压。



《南风窗》杂志社长陈中因下属一篇专访支持多党制的文章而被免职。

媒体受到的滋扰有时更是地方政府误用国家法例而致。二０一一年，中国媒体发生一些相对罕有的事件，一名记者调查一起刑事案件时，竟遭当地公安以国家机密为由恫吓记者不能报道。

九月廿二日，《南方都市报》调查记者许纪光报道河南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工作人员李浩涉嫌，在地窖非法绑架及禁锢多名女性，迫使与其进行性活动。三十四岁的李又被指控与两名女子被杀事件有关。有关报导刊登后，许纪光称立即遭两名自称当地公安的便衣人员恐吓，要求他说出消息来源，期间，更以「国家机密」为由予以威迫。九月廿四日，洛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丛斌向公众作出一般性的致歉。他指，公安的治安管理工作在一些区域十分薄弱。不过，郭并没有就事件何以涉及「国家机密」作出响应。他只谓，公安与媒体的沟通仍需改善。当天午夜，许纪光接过公安的电话后再未有就此事件公开表达意见。

十月九日，海口市政府人员蔡东海以「商业秘密」为借口拒絶回答《北京晨报》记者提问之余，更非法扣留记者。据《新华社》报道指，记者调查发现一所空壳公司未有实务经验及业务，竟能成功取得政府三份采购合约。当记者向蔡查问时，蔡起初以「商业秘密」为借口拒予回答，之后，着同事把记者关在部门内一间房。

不过，令媒体最感震惊是一名记者九月份被杀，不过，公安却火速地调查后将案件列作偷窃案。

另一起个案发生十月十九日，《南方电视台》记者路遥遥在广州越秀区采访一起非法停车场事件时，遭两名男子拳打脚踢及使用椅子袭击，引致路的前额缝了四针。

六月九日，中央电视台林姓女记者在位于朝阳区海殿的电视大楼外突遭一名不知名的男子持刀袭击，引致脸及鼻部受伤。据《环球时报》

六月十三日的报道称，徐姓嫌疑人袭击林之前，曾查询她是否电视台的记者，至于，公安如何调查则未有公布。另一起发生在沈阳市沈河区工商局长杨晓松及其亲人于六月八日，伺《辽宁晚报》刊登一则批评杨儿子名义开设的店铺，售卖的稷子质素不佳后，前赴报社捣乱。据新华社十八日报道指，杨意图向负责报道的记者找晦气未果，与在场人员扭作一团，报社两名高层期间受伤，报道又指，工商局局长向媒体打压封锁消息。

大陆记者被不知名人士袭击，并非奇事。九月十六日，浙江电视台记者张俊及赵挺采访一间跨国的美国纽约上市公司污染环境个案时，欲进入位于海宁市袁花镇的工厂内采访，被美国纽约上市公司——浙江晶科能源公司———保安员袭击，器材遭没收及损毁。翌日，公安声称已把三名袭击者逮捕。

廿三岁的《财经杂志》实习记者张贾龙于四月廿八日突然失去影踪。据报道指，张贾龙晚饭时突然被一名自称是北京公安的男子接触，并要求张跟他一起离开。自此之后，他便没有再跟



洛阳电视台记者李翔 （上图） 九月十九日清晨时份被杀兼失去手提电脑，引起业界极度震惊。他的同事 怀念他之余，更对公安未经详细调查，便迅速将案定性为抢劫案表示关注。



中国大陆记者采访而遭遇暴力对待，在境内已甚为普遍。《南方电视台》记者路遥遥便因采访疑违法经营的停车场，便被人用椅追打袭击致头破血流

亲人、朋友或公司联络达三天之久。张失踪前曾报道一些敏感的议题包括三鹿毒奶粉事件及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失踪。自张失踪后，他的父亲为寻找儿子的下落，在网上留言谓：「他只是一名记者，有问题应该跟其所属单位查问。」不过，有关信息随后亦在网上被删除。

自中国茉莉花于二月二十日在中国出现后，有众多人突然失去影踪，据坊间估计指，逾一百名人士先后被扣留，当中包括编辑冉云飞、作家野渡及前记者文涛等。

另方面，至少一起谷歌电邮成为攻击对象。财新媒体集团深度调查记者赵何娟发现其在谷歌开设的电子信箱，于七月十九至廿二日遭黑客入侵。她指，事件是她往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继续跟踪调查儿童贩运事件后发生。黑客的IP地址乃来自上述地方。赵在集团代表律师陪同下于七月廿二日赴居所附近的派出所报案。公安响应指，他们将会把个案转介到北京朝阳分局处理，并会尽快回复。财新媒体旗下的杂志《新世纪》于五月八日上载一则调查报道。报道指，湖南省邵阳市隆回县的计生部门职员，以住户违反中国一孩政策，强行带走超生的孩童或婴儿，之后将之贩运到海外。

干扰媒体的重手时甚至延伸致个人生活

官方媒体新华社属下《财经国家周刊》的记者石玉十月初，与一些朋友前赴探望失明维权

人士陈光诚后而被迫辞职。据网上多个消息指，石玉确认与一些朋友试图探望陈光诚后，遭杂志高层严斥而决定请辞。此外，消息指他与朋友抵达山东临沂后，被当地一些人反锁双手、遮掩双目数小时，全身更遭拳打脚踢及推进车内。陈光诚二０一０年九月坐满四年三个月的刑期后出狱，与妻子一直被监视居住。陈于二００六年因指控当地政府违反人权包括强迫妇女堕胎，后被控以毁坏公物兼组织群众扰乱交通而起诉定罪。

石玉在杂志入职只三个月，之前，曾在《南方都市报》工作。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指，石相信主管受到官方的打压，故他宁愿离开杂志免雇主再有麻烦。报道更指他说：「我没有为自己做的事后悔。」

山东临沂市政府一直恶名昭彰。一群不知名人士一直受人指示，守候在陈光诚的家门前不许任何人与之接触，每有人包括来自中国境内或海外记者欲前赴陈家便会被这些人殴打。国际记者联会曾致函予山东省政府，就记者前赴陈家时被不知名人士殴打作出投诉。美国国务卿希拉莉十一月出席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时，对陈光诚家人的处境表示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虽拒絶回应陈家的遭遇，但是，他指任何外国无权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四十三岁的四川作家刘贤斌因撰写数篇文章而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

公民记者在二０一一年亦遭遇同样的困境。四十三岁的四川作家刘贤斌在三月廿五日，因为海外媒体撰写数篇文章而被裁定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十年。遂宁人民级法院开庭审理两个半小时后，检察官提交了两篇文章作为证供包括一篇题为「街头运动是民主的主要形式」。刘的辩护律师莫少平指，刘撰写文章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莫及其它维权人士都批评政府处理案件的手法，包括刘被扣押长达九个月后方获准接触律师。刘是呼吁政府民主管治的《零八宪章》签署人之一，且早在一九九九年因协助创立中国民主党而被判刑十三年，另外，因八九天安门屠城事件而被判监两年半。



公民记者王荔蕻因常在网上发布讯息，二０一一年三月被北京公安拘捕，六个月后以寻衅滋事罪被裁定罪名成立，判监九个月。

中国法院使用惩罚性的策略惩处著名的调查记者齐崇淮，在其快将四年刑期满出狱之际，再额外判监八年。现年四十六岁的著名反贪记者齐崇淮于六月九日，再度被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滕州法院裁定其因敲诈、勒索及诈骗而判刑八年。齐的两名代表辩护律师指，法院的订罪是依据二００八年的定罪时，控方所用的同一控罪即

敲诈勒索罪的证据再度定罪。齐于滕州被囚禁时，曾遭狱方每天虐打，迄至事件曝光引起国际关注后，齐被转往另一个监狱囚禁，并安排在矿场长时间工作。齐曾于不同媒体工作包括《法制早报》。

公民记者王荔蕻因前年四月在网上发布信息兼组织集会，二０一一年三月被北京公安拘捕，先以扰乱交通秩序为由扣押，但事后却以寻衅滋事罪予以起诉，今年九月九日被法院裁定罪名成立，判监九个月。据《民生观察》报道指，王被捕时，全屋被公安搜查，家中计算机及书本更遭警方捡去，而王的家人则一直不知晓公安以什么罪名予以逮捕。王被捕前，一直向媒体提供地方政府违规事情包括强迫拆迁。十二月廿日，王刑满出狱。

创立《六四天网》的公民记者兼网站负责人黄琦，二００八年因四川大地震豆腐渣工程而遭政府指泄露家机密罪，判监三年，二０一一年六月刑满后获释，但是，据多个海外媒体报道指，其网站办公室却常遭四川政府滋扰，五度被迫搬迁。黄在四川大地震中，除调查建筑倒塌原因外，更向灾民提供金钱以解燃眉之急。出狱后，他仍继续尝试与灾民接触，但被公安阻截。



《民生观察》网站的负责人刘飞跃的手提电话及计算机每在敏感时期，便受到干扰，今年更被互联网服务供货商中断电讯服务。

《民生观察》网站的负责人刘飞跃的计算机亦无故受干扰。四月三十日，他的计算机遭中国大唐电讯突然中断互联网服务。他指，电讯公司中断服务前一天接获河北随州政府指示，官方称他浏览「非法网站」，但是却未有具名指出那些网站，便下令电讯公司中断其互联网服务。刘又谓，五月一日起，他的手提电话及传真机亦突然被中止服务，当地公安亦警告他不要参加「中国茉莉花」的抗议。刘谓，自己曾三度被随州的国保殴打，他相信事件与其营运一个关心民生议题的网站有关。另方面，该网站的义工于二月廿六日遭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公安，以其转发推特发布茉莉花革命的信息而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三月廿八日获准保释。

著名学者茅于轼于四月廿六日在《财新网》发表一篇题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文章后，翌日，他的办公室秘书便接获一名男子声称自日本来电的恫吓，该男子称会叫人打他。茅于轼的文章指，众多民众仍认为毛泽东是神，不准任何人批评他的往绩。不过，他认为，毛要为到中国多项灾难致不计其数的人无辜死亡承担责任，他且以三年的大饥饿及文化大革命为例子。文章刊登后，网上文章及相关的响应被删除，他指不知晓谁下的决定。茅指，过去在公开演讲后，他曾接获一些威胁性的对待，不过，与是次事件有所不同。《财新网》在中国境内被称为敢言的媒体，创立人是敢言见称的胡舒立。



著名学者茅于轼四月廿七日在发表题为「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后，接获一名男子来电恫吓称会叫人打他。

不少观察家均认为中国现时充斥着重返毛泽东年代的气氛，令到曾经在毛泽东年代受苦的民众感到莫大的压力。不少人均认为这股气氛是一种退步的表现，导致这状况源于不少中共党员建议中央政府进行政制改革而致。

六名作家及学者原订准备出席独立中文笔会七月廿三日于香港进行的十周年纪念活动，但是，却遭中国边防人员禁止离境。他们当中包括笔会的执行委员昝爱起、杭州作家兼律师庄道鹤，二人均自二００九年便被禁离中国大陆；北京媒体学者焦国标，他因撰文批评中国共产党而失去教职；去年被禁离境前赴美国出席电影研讨会的电影学者兼诗人崔卫平及作家刘荻。

中国茉莉花革命

随着中东及北非的茉莉花革命浪潮飘送到中国后，中国自二００八年奥运以来，出现新一轮针对表达自由、新闻自由及集会自由的打压。



二０一一年二月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出现后，迅速把中国的言论自由及新闻自由陷入「冰封期」。

自二０一０年突尼斯发生茉莉花革命后，过去数月，中国有效地持法律限制与事件无关的记者、律师、人权份子及学生，非法地拘留、干扰及威胁他们。一个细密监查的网紧罩着记者及其它人在互联网上自由地信息发布的自由。

国际记者联会认为这些重大兼日渐加剧侵害人权的行为，众多国际组织应立即作出行动要求中国政权予以正视。

当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倒台的消息传出后，茉莉花的「芳香」便随之飘送到中国，中国中央政府迅速行动把所有异见声音整肃，令茉莉花的「芳香」如一阵风被吹散。国保在未依循任何合法程序下，传唤盘问甚至拘留全国数以百计的异见人士。当二月十九日，周末，互联网上流传不知名人士上载「中国茉莉花革命」的信息，呼吁民众在每周日游行后，该则消息很快便被删掉。上载该则消息的网站《博讯》http://news.boxun.com亦随即遭黑客攻击致停止服务，「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官方网站(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亦承受同一命运。

同日，中国主席胡锦涛召开了一个为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安排的研讨会，提醒所有干部要「强化社会管理」技能，以致能确保社会稳定。胡在发言中提出的八项意见，他特别提及网络信息的管理，提高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水平，做到一直主张的舆论导向，即把所有导致官方权力受影响的负面或敏感信息导向官方认为安全的范围内。胡锦涛的说话期后被广泛诠释为，他向所有官方系统下达监控网络世界的指示。



主管社会治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谓，所有共产党干部应强化社会管治能力以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更清楚说明：「确保社会的矛盾与纠纷消灭于萌芽」。

主管社会治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于翌日（二月廿日）亦谓，所有共产党干部应强化社会管治能力以确保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他更清楚说明：「确保社会的矛盾与糾纷消灭于萌芽」。周永康的讲话刚好是网上推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着民众游行的首个周日。

二月廿日，数之不尽来自不同执法部门的执法人员穿上制服或便服都涌到建议的集会地点控制人群。众多执法人员假扮成行人、学生或道路清洁工人在集会地照，并试图在人群里的参与者或采访中的记者口中套取信息。



当年青人有任何动作，公安便每迅速趋前带走，并试图阻记者拍摄采访 图片由路透社提供。

除了大批公安在街上涌现，网上信息亦被筛选。北京王府井有逾千名群众按呼吁齐集后，有数名青年很快遭公安在未给予任何理由带走，有青年更因手持小撮茉莉花后被公安粗暴地押走。是类情景同样在上海发生。不过，在首个周日，公安只聚焦游行的参与者。

在首次的周日集会中，记者采访时遭穿上制服或便衣人员阻挠、干预及粗暴押走，但是，仍未出现记者遭暴力对待，可是，情况却在随后的周日集会即二月廿七日出现，记者更成为被针对对象，至于有十六名外国记者身体受到暴力对待，有一名录像记者被一名穿着制服的人士推到地上，该名记者期后更遭相信是假扮清道夫的执法人员踢及用扫帚打头。有些便衣的探员则假扮学生接触记者，试图套取记者对中央政府的看法。

在首两次的周日集会中，公安迅速地带走多名前赴到建议集会地的人群，不过，被公安带走的人数远超出相关数目。在首三周里，被公安带走的人数有逾百人当中包括记者、艺术家、博客、异见人士、维权人士及律师，他们被公安无合理解释下盘问、扣留或软禁在家。

被针对的人士中包括作家冉云飞、维权分子丁茅、陈卫及朱虞夫，他们分别在二月十九及廿日被公安扣留，期后更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自四月三日于北京国际机场被公安带走后，一直没有释放。迄至，国内外多个民间组织质疑公安行动的合法性后，公安方称艾未未疑涉逃税。为艾未未工作室出现义工的文涛同日亦突告失踪。

虽然，无实在证据证明有人策动这场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但是，就已经有人因传送相关信息或在社交网站如微簿或推特写上支持一词而被指控。冉、陈、丁及艾过去均有就二００八年四川发生大地震，导致至少七万人死亡的惨剧敢于批评四川政府。

国际记者联会最近更获悉在《南方都市报》出任记者的宋志标因于五月十二日，在社论中以曲笔的手法推崇艾未未后，便面临辞退的威胁。众多被扣押的人士其实并未有就中国茉莉花革命表达意见甚或参与，不过，他们往往因一些刻意营造的控罪予以拘禁，这些控罪包括非法集会、煽动社会混乱及危害社会治安。

被扣押的人士中，有些已被获释放，不过，他们却拒予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亦未有透过社交网络披露消息，这现象较过去甚为罕有。一名推特用户更谓，曾被扣押过的人自获释后，已很少在网络中谈及茉莉花的事，因为国保人员

严密监视着网上的信息传送。

至少有两人分别是华春晖及魏强被判入劳教所。魏因在二月廿日于王府井集会地点拍照而被公安拘捕，期后则因被控非法集会而判入劳教所。亦有不少记者及公民记者因报道本土的新闻，或于微簿及报纸报导艾未未的事而被国保人员扣留问话。

六月廿二日，艾未未获官方以其「认罪态度良好」准许保释，不过，艾仍受到多项条款限制包括不许离开北京。其余各人之后亦陆续获准释放，且保持低调。

据《自由亚洲电台》六月廿四日报道指，艾未未投诉整个逮捕致起诉程序不公。十一月一日，北京市税务局要求艾未未在十五天内，缴交罚款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约二百万美元）。网上捐款期后立即展开，捐款者透过银行或现钞给予艾，款额约达八百万人民币。艾与妻子期后指款额会用作上诉，未几，艾被北京公安调查指控二０一０年间与四名女士拍摄不雅照，相中，艾与女士们均裸露。一些评论指，有关图片充满讽刺意味包括讥讽共产党。

艾且披露被官方拘留约三个月间，有一名「保安」廿四小时盯着他，不过，他并未遭虐待。

艾的情况跟其它多人的经历并不一样。国际记者联会获悉作家野渡、维权律师李方平、江天勇等人在扣留典间，均遭到不同程度的身体与



维权艺术家艾未未因税务问题，被官方褫夺近三个月的自由，迄今仍被中国官方以其它事件指控。记者知悉艾获释后，在其家外等候至深夜静待回应。（图片由《明报》提供）

精神虐待。精神与身体的虐待包括连逐数天禁止睡眠、日以继夜的盘问、关禁在一个不见天日的暗黑房间里、被脱光衣服、被污言秽语侮辱、身体被虐待、不准与亲人见面或对话，即使亲人或邻舍也被滋扰。

二月十九日，作家野渡便被国保带走。国



艾未未获释后，家门外的灯柱上增添了摄录机，长时间对照着艾家门口进行全天候式摄录。（记者提供图片）



作家野渡（图左）被扣押时，精神以致躯体都受到虐待。他更被引述指，广东省国安更给他看一纸「记者黑名单」迫他说出与谁熟稔。

际记者联会透过其朋友获悉，野渡并没有参与任何示威抗议活动，且向国保三番四次交待，但是，国保未有理会。该朋友谓，野渡相信自己被扣留跟他在当晚与一些朋友晚宴时，一起闲聊过该「革命」之事。

在盘问期间，野渡被罚坐在温度调致很低的冷气机出风位下数天，并要接受廿四小时式的盘问，期间更一度被禁止进食致其胃痛发作。

有一次，国保更罕有地给他看一张纸，名单上列有在广东省工作的部份记者名字，要求他指出谁参与了该「革命」。国际记者联会获悉名单上，列有敢言著称的记者长平的名字。另方面，本会亦获悉众多记者被跟踪及跟不同省宣传部官员会面，其中一名记者更谓：「他们拒絶电话讲。事实上，他们没有说什么，只不过不断重复说要保持社会稳定。」

另一名著名的四川媒体工作者冉云飞亦在「中国茉莉花革命」事件发生后，很快被国保带走。四十五岁的冉是《四川文学》的编辑。他于二月廿四日即「中国茉莉花革命」廿日出现后第四天，四川国保以其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而被带走。三月廿八日，他的妻子王伟接获公安通知冉被拘捕起诉。六月廿七日，中级人民法院以案件欠缺足够证据发回案件予检察院，不过，冉云飞仍被扣留至八月九日方获释放。他现正接受公安监视居住直至二０一二年二月九日，但原因却未交待。

虽然，无实在证据证明有人策动这场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但是，就已经有人因传送相关信息或在社交网站如微簿或推特写上支持一词而被指控。冉、陈、丁及艾过去均有就二００八年四川发生大地震，导致至少七万人死亡的惨剧敢于批评四川政府。

国际记者联会更获悉在《南方都市报》出任记者的宋志标因于五月十二日，在社论中以曲笔的手法推崇艾未未后，一度面临辞退威胁；另一名《财经杂志》实习记者张贾龙亦一度卷进艾未未的失踪事件而失踪了三天。张过去曾报道一些敏感事件包括三鹿毒奶粉后事件的进展。

被扣押的众人被扣留了数月后获释，不过，他们却拒予接受任何媒体的访问，亦未有透过社交网络披露消息，这现象较过去甚为罕有。一名推特用户更谓，曾被扣押过的人自获释后，已很少在网络中谈及茉莉花的事，因为国保人员严密监视着网上的信息传送。



四川杂志编辑冉云飞一度被官方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指控。现需获释但仍被监视居住。（图片自Flickr由Rebecca MacKinnon提供）

至少有两人分别是杨秋雨及魏强被判入劳教所。杨因在二月廿日于王府井集会地点拍照而被公安在三月六日拘捕，期后则因被控非法集会而判入劳教所。亦有不少记者及公民记者如郭伟东于三月十一日被捕，四月十日却获释等候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的审讯。

另一名同样被指控涉嫌「煽动国家政权罪」的公民记者胡军于五月九日被起诉。可是，有肢体残障的胡军对本会重复强调，他并没有参与示威行动，只是，在互联网上转发了数篇相关的文章，法院在察看检察院提交的文件后，两度指证据不足而发还检察院，可是，有关指控仍然存在，他且正接受监视居住。胡军是权利运动网站行政人员。

新一轮镇压下，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工作的条件戏剧性急变。二００八年奥运后，国务院延续予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条款，即记者只须得到当事人批准后便可进行采访，可是，中国茉莉花革命浪潮出现后，记者在华采访的情况出现大倒退，有政府人员要求记者除取得当事人同意采访外，还要向负责当地主管的政府部门申请采访准许，此外，不少答应采访的被访者因受到官方的打压最后被迫婉拒采访。

所有大学或寄宿学校的校方人员更突意向学生发放通告，着学生不许在校内集会外，此外，在清明节前更通告学生一旦离校回家，他们需要向负责的老师汇报行踪，并且说学生不该在外聚集。

不少聚结人群的活动如基督教教会聚会、演唱会、艺术展览、文化活动，甚至纪念一百周年的辛亥革命的研讨会亦被阻止进行。出售茉莉花的花店、花农亦被禁止出售茉莉花，相关的广告亦统统禁止。

人与人之间的日常生活也受到严密监管。当有人在电话中说出「茉莉花」一词时，有关的通话便会立即被中断，该词在网上更被禁止。有谷歌的电邮信箱用户更投诉指，很困难方能进入电邮信箱，而谷歌则指经过查检系统后，肯定问题与公司的系统运作无关。公民记者亦都向本会讲，他们上网时也会被服务供应中突然中断，个中原因谓他们登陆查看「非法」网站。一些网民亦投诉指，他们即使用了翻越有中国防火墙之称的VPN软件，但仍有困难登陆一些海外网站。

同样，市民用手机发信息时，若写有「茉莉花」三个字时，有关信息便不能传送，即使中国主席胡锦涛于二００六年外访肯亚时，跟学生一起唱脍炙人口的「茉莉花」的民谣，有关的视象片段亦于网上被封。

不计其数传讯中断的个案出现源于中国电讯业出现寡头垄断。中国境内的电讯网络供货商都是由中国政府所控制，再者，所有网络服务供货商都必须要签订自我监管的协议书，同意网上不发放「非法」信息包括淫秽、煽动社会骚乱及分裂国家等信息。地区政府及网络供货商更各自聘用大量「网络评论员」，以协助监察网上的信息。这些评论员肩负众多责任，当中包括监察网上有否敏感信息，发现后要向网络管理员汇报，以便把相关信息删除。同时间，他们也要参与论坛及社交网的讨论，以便把一些热点讨论的话题如房地产价格或通涨等敏感议题，核心点转移。这些网上评论员更有人来自新闻界。

国务院新闻办已于五月四日成立了一个新的部组，虽然，它声称成立的目的是统筹及完善网络的工作及运作，因为现时有份参与网上管理的部门繁多，但是，部组成立的目的明显为了有利于网络的监控。现任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及中宣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王晨。

2011:大陸新聞界失去的一年

余炎奇

对中国大陆新闻界而言，2011年是无所事事的一年。经过前三年以大事件为主导的宣传压制——08年川震和京奥、09年中共掌国60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新闻界静候2012年中共十八大到来。前几年的舆论控制所产生的威慑力继续发挥效应，同时忌惮于破坏国家领导人轮替的仪式氛围，大陆媒体战战兢兢，像进入冬眠的动物一样，苦捱冬天过去。

采取无所作为的守势，并不能让大陆记者更安全。相反，2011年的大陆新闻界失去发声呐喊的机会，精英媒体失去与社会读者的紧密联系，失去异地办报的机遇，更关键的是，知识界失去了一批秉持新闻价值观、坚持专业主义操守的记者及评论员。他们被勒令离开工作岗位，必杀令来自中宣部，并由保守的各省宣传部和恐惧的媒体高层执行。

在集中了中国最敢言媒体的南方广州，著名报人长平（真名：张平）被从南方大院赶走，南方周末的评论主笔笑蜀（真名：陈敏）被清退，中国评论界中实力最强的南都评论部被迫改组，负责人李文凯调职，有评论员和评论编辑被划为危险分子而去职。南方报业开除员工会小范围里透露迫于中宣部压力，但对外则给出不称职、主动辞职等借口掩人耳目。

这些职业媒体人的离开，令大陆时政评论界的锋芒为之黯淡，以时事评论引领舆论风潮的格局为之受挫。上海高楼火灾惨剧、温州高铁追尾、广州新塘暴动等事件中媒体先于禁令而停止报道就是例证。这个后果是政府想要的。在微博风行的形势下，李长春、刘云山、蔡名照等意识形态高官恐惧新锐报纸和精英记者、社论作者的挑战，蔡曾到南方报业调研，对长平等人厌恶至极，参与圈定定点清除南方报业的记者名单。

在2008年的记者节中，李长春罕见地发表告新闻界讲话，提出了遏制媒体及其记者报道权和生存权的“两管”方针，就是：党管媒体、党管干部。不服从的媒体及记者将面临更严厉的制裁，2011年所发生的这些可以追溯到这一近似铁幕的管控原则。清除优秀记者、重组评论等重要部门，从而制造威慑效果，杀一儆百，以强化对其他记者的心理压力。

除了中国南方，以揭黑报道著称的北京《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也在下半年遭撤职、下岗，他领导的深度调查团队被整体解散，他还成为敏感词，国内的搜索引擎屏蔽了他的信息。在年初，《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因报道一起黄山救险事件被辞退，真实原因是他暗示救援工作前松后紧，是因为遇险者中有亲戚是上海高官，打了招呼才促成救援。

2011年针对记者的整肃行动，矛头指向倡导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的南方系，指向深度报道和时政评论部门。这是因为南方报业及其代表人物的影响力让中宣部深为不安，它们挑战新闻管制的努力惹恼了高层。中宣部将定点清除记者评论员当成意识形态的斗争，加之南方报团总编辑轮替引起的一系列内外权斗，令报社保护员工的积极性近乎衰竭。

党决心捍卫它在新闻媒体中绝对的权威，对可能动摇威权的记者毫不留情，这说明中共已经不再忌讳在国内宣示强权，党的实际做法也与它在国际传播中竭力塑造的开明形象相抵牾，体现出暴力和残忍的真实面目。据不完全统计，2011年被辞退或转岗的媒体人有长平、笑蜀、王克勤、李文凯、邓志新、宋志标、龙灿、李建军、石玉等人。

中宣部把持的宣传系统称为控制大陆媒体和记者的黑暗力量，还要注意到，这种黑恶势力不仅直接摧毁有责任感的职业记者，还在媒体内部诱发了恶劣的自我审查机　制。南都禁止刊登一切有关花的图片，怕引起对茉莉花革命的联想；不刊登空椅子和仙鹤，怕引起对刘晓波获诺奖的联想；禁止一切与坦克有关的图片，怕引起对天　安门事件的回忆。

这一点是2011年出现的非常明显的现象，预示着在党的高压控制下，大陆媒体和记者“下流化”的趋势。在抨击宣传部门干涉记者权力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媒体内　　生的审查机制对记者的伤害。实质上，在宣传部的压制下，大陆报社内部的自由派的生存空间变窄，保守势力开始借助环境压力清除异己，这也是大陆新闻界在今年　显露的丑陋一面。

中共最高决策层9月份召开文化体制改革会议，研究部署繁荣社会主义文化，随后下达限娱令，这与此前北京宣传部接管《新京报》遥相呼应，都显示从记者生存的大　环境在赤化和恶化。北京宣传部的动作具有象征意义，它进一步排除了南方报团在新京报的影响，在京城新闻界压缩自由派记者的势力范围，这是大面积打压记者、　开除社论作者的政治因素。

长平离开大陆后，流亡在香港等地，主编了新锐的时政杂志《阳光时务》，尽管apple store阻断其大陆读者的下载，但依然被广泛传阅，尤其是杂志的全媒体形态及对中国政改的崭新观察，深得人心。笑蜀则匿名参与编辑另一本评论杂志，王克勤也在《经济观察报》低调地新建深度报道部门，大陆记者没有被高压吓怕和打倒，仍在进行言论自由的抗争。

正如长平在被辞退后说的那样：“我失去的只是镣铐”、“我们在哪里，哪里就是传播平台”。尽管2011年让许多记者流离失所，但大陆新闻界仍有正面力量蛰 伏，等待墙内与墙外的支持与呼应。大陆记者对新闻自由热切向往，他们为此付出代价，牺牲颇多。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流放，请国际上的仁人志士始终不要忘 记，中国大陆记者仍然生活在言论不自由的“枪口”下。

茉莉花开之后

柯以

当收到短信，说南方报社被警察包围起来，而且二楼食堂里挤满了武警的时候，我看到了历史的停滞。

那是2月20日，无名网友发动中国茉莉花革命的第一天。一则网络传言让政府如临大敌，而政府采用还是几十年不变的老一套，那就是出动武力严防死守，尤其对媒体机构重兵把守。紧接着是一轮恐怖清算。艾未未、冉云飞、滕彪、余杰等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莫名失踪，无辜被囚，与其说是他们做了什么，不如说是他们说了什么。即便是艾未未对四川地震中遇难学生的调查，很大程度上也属于知情与表达的权利。

这些私刑般的惩罚使得言论空间大幅紧缩。这些勇敢的正义之士被经受折磨数月之后被放出来，大多也不敢为自己的遭遇鸣冤，更不敢再向从前那样对社会不公进行猛烈抨击。

这些打击对媒体的影响显而易见。南方报业经过多番整顿，事实上用不着大兵压境，也能够分得清大是大非。尽管他们仍然保持在中国新闻界的良心代表地位，但是经过年初调整之后的评论版面显然已经锋芒尽藏，尤其在挑战体制的话语上大幅退缩，在一些重要的议题上甚至比不上上海《东方早报》的力度。

《东方早报》并非一枝独秀。近年来报纸时评版面的发展，普遍因袭《南方都市报》开创和拓展的思想脉络和作者队伍，使得若干风格各异的媒体呈现出类似的言论倾向。像上海的《新闻晨报》、陕西的《华商报》、深圳的《晶报》等媒体，从新闻报道中基本上看不出观念诉求，但是言论也日渐突出。

茉莉花革命之后，所有媒体的言论都更加谨慎，但是，整体的风格也还没有完全改变。在南方报业的媒体锋芒减弱之后，各地言论的平均质量仍然较以前有所提高。尽管如此，高压之下，媒体言论出现了集体平庸化的倾向。

网络媒体一向被看作突破禁区的希望，中国茉莉花革命的号令也是从网络发出。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风波之后，中共政府对网络的监控力度空前增大，而且手段更加多样化。

微博作为一个新媒体的主要阵地，的确为无数社会弱势和边缘人群提供了发言平台，使得他们的声音终归有地方发出和传播。然而，以新浪为主的微博，一开始就采用了反世界新媒体主流的各种手段。比如采用明星制、划分VIP用户和普通用户、引入粉丝竞争机制、设定议题等方式，与世界新媒体主流呈现的去中心化、反精英、平等交流等观念背道而驰。而这些手段都为官方管制提供了便利。

官方对网络媒体的管制精细化操作，针对不同的网站、不同的用户群都用不同的政策，其策略仍然是对敌斗争的两种方式：拉拢或者打压。那些既爱慕虚荣，也从中得利的文体明星，心甘情愿成为马前卒。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在温州动车事故这样的突发事件中有出色表现，但是整体上仍然以风花雪月、浅薄议政来转移民生、自由与民主等焦点问题。以至质疑红十字会腐败问题的“郭美美事件”在网络上风生水起之后，有人认为这是有关部门有意而为，乃是权力斗争之一角。虽然此说难以证实，未必准确，但它反应了人们对于网络管制的心知肚明。

10月份传出广东言论开放的消息，得到包括一些异议人士的广泛喝彩。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刻意塑造改革形象，号令加强省内舆论监督，确有其事。然而，从效果来看，正如一家香港媒体所报道的那样，媒体工作者的压力不减反增。盖因为言论自由的真谛在于领导少管甚至不管，媒体能够独立判断新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领导动员舆论监督与禁止舆论监督，不过是一块硬币上的两面。汪洋2007前赴任广东伊始，就曾大谈思想解放。到了今天还要动员舆论监督，本身就是一个讽刺。

媒体工作者不相信汪洋的动员，一方面是这六十年的历史教训，大鸣大放完全成为引蛇出洞之策略，之后随时可以大力打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经历了茉莉花革命之后，编辑和记者更不相信政府和政府官员。普通民众也是如此。总理温家宝在7.23动车事故之后的现场讲话，仍然是声情并茂，但是网络上挖苦嘲笑的他的声音也比以前更多了。

中共政府对于传统媒体的控制得心应手，而对于新媒体还属于忙于应对的阶段。尽管近年来不计财力人力，应对手段大幅提高，但是新技术和新观念的变化仍然有可能将其远远抛在后面。一方面，应该鼓励那些以各种方式翻墙的人们，以及各种反控制方法的开发。另一方面，要对密切配合政府的商业机构，也应该进行曝光与谴责。

因为反抗言论钳制而受到伤害的编辑和记者，如果能够得到帮助将是最好的鼓励。然而，来自海外的直接帮助，很少有内地甚至体制内的媒体工作者敢于接受。因此，进行广泛的舆论声援是一个较好的选择。同时，如果能够协助境外机构，为它们提供更多的考察学习的机会，有助于他们专业能力的提升，也是一个有效的帮助。

针对政府官员的开明表态，则需要谨慎的考察。假如只是口头宣讲开放，那么对于媒体发展及言论自由来说，益处并不多见。更重要的是推动制度变迁，建立法治环境，推动媒体独立。

外国记者在中国

二０一一年，外国记者在中国的工作环境持续性地恶化。中东茉莉花革命的出现营造了大量机会予中国的便衣公安以粗暴及凶悍的态度对待外国记者。

多名记者欲前赴采访长时间被监视居住的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时，竟遇上滋扰之余更被人用石头投掷袭击。

二月廿日，在北京、上海及广州发生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抗议事件发生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发出「重要通知」予会员。通知指「为确保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能持续地运作，我们现不会持续地在官方网站上发布记者被侵犯报告或声明。」不过，声明同时通知会员，他们可以直接与协会职员联络进一步查询。简单的通知暗示外国记者在华采访时遭遇众多滋扰的经验。

采访「中国茉莉花革命」抗议

二月廿日，北京、上海及广州的一些公众地方出现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抗议。基于公众关注事件，所有外国、香港及台湾记者簇拥到有关地点采访。

不过，抗议还未进行前，一名在广州采访的记者对本会谓，她在集合地点中见到大多数的人都是便衣及穿上制服的公安，相反不见有任何抗议人士。她说：「我十分相信公安的人数远超过抗议人士。公安更扮作消费者坐在抗议集合地旁的一间咖啡店监视着。」另一名不欲披露名字的记者则指，他遭一名便衣国安贴身跟踪，图阻止他接触多名在广州活跃的异见份子。当记者欲采访参与示威，但被五名国保殴伤的维权律师时，他被阻止兼威吓。他说：「当我用手提电话拍摄国保阻止我前行时，试图抢我的手提电话。」最后，该记者的手提电话被国保损毁。

在北京及上海，众多示威在集合地点聚集。据多份非大陆的媒体报道指，记者欲拍摄或摄录有人手持茉莉花，安静地聚集在集合地点时，被公安及身份不明的人士阻止。众多记者投诉他们的器材更被公安损毁，同时间，公安反用相机把他们的脸容摄下，兼搜查他们的个人物品。

第二次的「中国茉莉花革命」抗议时，公安的应对组织较上一次明显增强。二月廿七日，据多份香港媒体的报道指，众多在北京王府井采访的记者包括香港、台湾及海外记者被公安扣押。这些记者包括Bloomberg TV, BBC, CNN, Sanli , 法新社, German state broadcaster ARD、香港《亚洲电视》、《无线电视》、《有线电视》、《香港电台》及台湾的iSet等都被公安或不知名人士威吓，殴打及扣留。

据《华尔街日报》指，Bloomberg 电视台记者Stephen　Engle更被公安推跌及按在地上，之后被一名穿着街道清洁工人的男子用扫把拍打。

《亚洲电视》报道指，一名摄影师与记者及《无线电视》的摄影师被扣留多个小时后方获释放。另一份媒体报道指，《亚洲电视》纪录了示威情况的录像带更被公安删除。

美国的《自由亚洲电台》及日本的《共同社》记者在广州被公安检查身份证。《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谓：「一名便衣探员扮作「示威者」以为我是示威者便走近我，试图想从我身上得到数据。他更用iPhone拍摄我。当我离开时，他示意穿上制服的公安查我身份证。」

三月一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羌瑜被问及记者被公安殴打及阻挠采访时，她指控记者在上述两次示威中，违反公安设置的采访限制。她再进一步指，记者必须要「配合」



便衣探员（图右）偷偷地在胸前提着有摄录功能的手提电话拍摄街上的人士。（图片由《自由亚洲电台》提供）

公安，不过，当羌瑜再被记者追问那些限制记者违反时，她拒予响应。

虽然媒体承受众多官方而来的压力，他们仍旧按原有的示威组织所订的日子在三月六日继续采访。但是，中国官方却单方面更改外国记者在华采访的条例，并以可能延长记者的工作签证批核作为威胁，阻止继续采访。

不管记者有否采访示威活动，众多名记者都被官方提醒他们欲继续在中国工作，他们必须要有工作签证。有些记者更被告之要遵守中国法律。



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否认有记者因采访抗议而被打。

北京王府井突设采访阻制

中国官方在三月二日，更以防止交通阻塞而突然要求记者在北京王府井采访时，必须要事先登记。此突然出现的限制，明显抵触中国国务院二００八年北京奥运完结后，就外国记者在中国采访的规则要求。二００八年针对外国记者的规则中第十七条、二００九年针对香港及澳门记者的规则中第六条及台湾记者的规则中第七条，记者只须得到被访者同意便可采访的做法。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一直提醒记者在中国采访时，需携备自己的记者证及证件。

虽然，突然出现新添规限的行政措施，有记者仍旧按照新规则登记以便在王府井采访，不过，有关登记却被拒絶。一名日籍记者对本会谓，他尝试申请准许证入王府井，可是，他的申请却被拒絶。「他们说，那段时间正是政协及人大会议期间，相信街上有很多人，所以，不准拍摄。」

他又讲，外国记者的工作签证除了要得到外交部的批准，还要得到公安局及宣传部。另一名外国记者谓：「情况令人非常担忧，奥运会争取到的采访自由倒退了。他们若可以在王府井做，他们便可以同样在其它公众地方做。」

三月六日，多名记者在上海采访时被扣留，记者当中包括杂志Stern的记者Janis Vougioukas 。他指，至少有十五名记者被困在一个地下室超过三小时。

翌日，中国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否认有任何记者在采访两会期间被殴打，他更指，中国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

记者采访失明维权人士被袭击

记者采访著名维权人士时，遭遇重重困难。二月十六日，美国《有线电视》记者Stan Grant 及 Steven Jiang报称，他们欲进入东师古村，采访长期被监视居住的山东失明维权人士陈光诚及妻子时，遭多名人士阻挡、推撞及用石头袭击。



维权失明人士陈光诚自二０一０年九月九日刑满出狱后，直至今天与妻子一直被困在家，不准外出与人见面，记者前赴采访更遭不知名人士袭击。

江姓记者在报道中谓：「我要求他们给予解释为何阻止我们入村，一名个子高大的男士推Stan离开检查站，他的伙伴按着我们另一名同事Brad的摄影机。当我们试图步离村庄时，两名守卫更执起多块石头掷向我们及车辆，同时间大声喝喊「滚！」及「不准影」。我险些被石头击中。」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亦接获多名会员投诉，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士手提对讲机阻挡村的入口处，他们推及威吓记者、损毁记者的车辆、充公或损毁器材及抢夺记者的记者证。

当记者致电当地公安投诉时，当地公安并没有给予援手。除了美国有线记者有此遭遇，还包括Le Monde 记者Brice Pedroletti , The New York Times特约记者,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记者Stéphane Lagarde 及Le Nouvel Observateur的记者Ursula Gauthier。

十月廿日，McClatchy Newspapers记者 Tom Lasseter在村的附近被拦截。一名便衣国保更试图拉记者的譯释员离开车辆。他们离开时，更发现那些人高速驾驶跟踪他们直至他们的车到达另一个检查站。记者事后欲采访当地政府官员却被阻止，当向临沂市宣传部官员追问时，该名官员更否认收过有四个采访要求。

据《自由之家》指，陈光诚的家附近，至少安装了六部摄录机及两部干扰手提电话的仪器，保安则廿四小时监视。此外，约廿名人士在往陈家前的高速公路入口处监视。据报道指，当地聘请了约一百人阻止外来访问，每人每天工资人民币一百元（约十五美元）。

即使如此，众多关注事件的人士持续地前赴上址尝试探访，不过，都遭到不知名的人士甚至公安阻挠、扣押甚至充公财物。中国大陆著名记者王克勤、石玉及博客翟明磊都报称遭遇过类似经验。

二月十七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提醒所有记者「倘若前赴山东进入维权人士陈光诚居住的村庄，记者宜加倍小心。」

陈光诚是著名双目失明、赤脚律师的维权人士。他于二０一０年九月九日因「故意财物和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被判入狱四年三个月后刑满出狱。不过，自出狱后，他与妻子便一直被监视居住，不准二人与外接触。多名非中国大陆的记者多次试图与之接触，但都遭到当地政府阻挠。陈氏夫妇的电话亦被中断线路。他们曾成功将自己的处境摄录，并透过一个美国的维权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上载到You Tube视频向外披露，之后称遭人殴打。有关报道引起中国境内多人关注并组织起来十一月初前赴陈家探望，不过，没有一个人成功避过那群流氓。

媒体在中国的安全转差

国际记者联会于三月八日致函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Navanethem Pillay就媒体在中国境内的安全，及采访的权利被单方面更改，事前并没有向业界进行任何知会或咨询，表示极度关注。

五月十九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后发现百分之九十四的被访者指，记者感到在华采访的情况转差。调查中又见，约百分之七十的被访者表示曾经验到被滋扰，百分之四十指被访者与记者接触后，曾遭受官方滋扰、扣押、问话或迫害。Reuters报道称，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被问及有关问卷调查时，他的响应指外国记者协会「没法律地位」，不过，重申中国会「持续增加采访自由」。



乌坎村村民抗议事件后，只有很少外国其他记者及香港记者能够成进入乌坎村，其它记者均被公安在外阻止进入。（图片由《明报》提供）

增加内蒙古采访限制

虽然，外国记者已被迫习惯在采访一些敏感地区如西藏时会提出申请，不过，申请鲜有获批。但是，有关限制在二０一一年间更扩展到内蒙古。

五月十日，内蒙古南部一个牧民组织的负责人Mergen与其它人图阻挡采矿货车进入牧民草原区Ujimchin时遭辗毙。据Southern Mongolian Human Rights Information Center指，Mergen与其它人试图阻止车辆进入草原时，他的身躯被货车辗过后更拖拉了一百五十米，之后，再被其它货车撞。

Mergen的死讯立即引起当地居民持久地对采矿公司及雇员拥入内蒙古南部草原的愤慨。五月廿三日，连串的抗议示威一触即发。

上述人权信息中心指，内蒙古自治区政府迅即禁制媒体报道有关死讯及抗议示威活动。博客被禁止在讨论区或其它社交网络讨论有关死讯，媒体亦鲜有报道有关死讯及其后发生的事情。当地学校亦被公安重重看管，校方着学生不能离开校园。

数以千计包括众多学生都未有理会，仍旧继续参与和平示威。五月廿七日，Xilinhot更出现众多人被公安或军警带走。中宣部及省宣传部亦下令禁止独自采访或引用其它消息来源报道，倘若报道，便必须引用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报道。互联网上有关的信息及文章都统统被删除。

据英国《卫报》五月廿七日报道指，记者Jonathan Watts遭当地公安以「不安全」为由，阻挡前赴案发现场采访。同一日的凌晨四时三十分，他在酒店房内更被两名便衣人员唤醒，进入房间问话。

香港新闻势危

香港的管治权自一九九七年由英国交回中国后，香港便实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中英两国所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中，中共前领导人邓小平所建议的「一个两制」的制度。

回归以来，十四年间「一国两制」经历过种种严峻的挑战。不少人因有政治背景而被禁止进入香港境内，而香港拥有的集会自由在政治议题的活动中却受到侵蚀。

近年间，香港良久拥有的新闻自由的声誉亦受到严峻的挑战。香港的媒体正面对多方面的行政限制，在过去一年了，香港记者更首次在执行采访职务时被恐吓、扣留及拘捕。

人权保障被漠视

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三章第廿七及三十九条与《香港人权法条例》第十六及十七条，香港居民的言论、新闻、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组织和参加工会、罢工的权利和自由。这些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列明的权利都有纳入在香港本土的法例条文中。不过，当香港记者或市民尝试行使这些权利时却往往遇到滋扰、干预或扣留。

二０一一年四月，香港大学向公众进行一项调查发现，在回复的市民中有百分之五十四相信香港新闻界有自我审查，这纪录更是自香港一九九七年回归以来创下的新高纪录。

媒体的自我审查主要反映在不愿批评北京中央政府。同时间，调查又录香港媒体的公信能力较以往下跌至六点零三分。国际记者联会属会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表示，就自我审查的结果，她谓：「这已经不再是媒体做了多少，而是有多少媒体已经将自我审查内化了而自己不自觉。」

九月二十日，香港大学的另一次调查揭示了香港市民对香港新闻自由的信心下降，不管公众对新闻界的公信力有增加。是次调查是在《亚洲电视》管理层涉嫌干预新闻部的独立，及《香港电台》委任公务员邓忍光出任广播处处长后进行。

无理据下扣留

香港的新闻界受到连番滋扰在二０一一年下半年不断展现。

二０一一年七月一日，《新唐人电视》蔡姓实习记者，十九岁，及网上电台《青台》张姓记者因拍摄采访千多名港人，为纪念香港主权自九七年由英国回归中国管治的抗议游行活动，被香港警方扣留了整个晚上。他们跟国际记者联会表示，他们被警方查问时，已向警方披露自己的记者身份只是当时未有携带记者证。香港警方未有理会立即把他们带走并扣留在香港仔警察局逾十句小时。在扣留过程中，香港警方更试图扣留人所共识的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沃启。罗当时与一群摄影记者站在一旁，观察纪录香港警方把一百七十九名示威者带上警车的过程。警方拘捕的示威者数目更是二０一０年数目的三倍。香港每有示威行动，罗沃启都会在场监察香港警方执行职务。

两名记者蔡及张三番四次重申，自己并没有参与示威。张说：「我没有在抗议游行中参与示威，我只是拍摄相片。香港警方扣留我只不过因为我没有记者证。」不过，警方未有理会其申诉，张及蔡二人的释放均被拖延。

蔡谓：「我被警方扣留后，我的雇主迅速



十九岁蔡姓电视台实习记者（蓝衣者）案发时，站在一旁用相机摄录警方抬走示威者。但是，却与旁边的人权监察者罗沃启（橙衣者）一起被警方示为示威者被带走。（图片由《新唐人电视台》提供）

传真我的身份证明文件兼附有公司的盖印到警署。他们却拒絕释放我，即使我的雇主五度致电警署。他们的理由是「信件与公司的盖印需要核实真伪」。」香港警方最终以「扰乱公众秩序」为由落案拘捕蔡。

国际记者联会连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及亚洲人权委员会在七月十二日发出联署声明，就记者及人权捍卫者被扣留表达关注。

本会虽未有接获香港警方就此事的回应，但是，蔡姓记者期后向香港警务处长提出司法复核，九月中，香港警方咨询过香港律政司的意见后，终撤消指控。蔡现正就此事向香港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作出投诉。

不幸的是，扣留及指控记者的行为却继续延续下去。八月十一日，三名记者包括《明报》的曾姓记者、《星岛日报》的邓姓记者及《资本一周》杂志殷姓记者被警方以涉嫌爆窃扣留盘问。三名记者被指控源于三人在新建的香港政府总部进行调查性采访。他们在政府总部登记处登记兼取得访客证后，进入新大楼内测试保安系统。在测试的区域内，他们并未察觉有拒絕访客的标示或警告字句，结果，三人被警方扣留兼问话。不过，警方却未能展示有实质的证据证明三人抵触任何法例，最终，三人被扣留达六小时后方准释放。

李克强访问媒体受限

八月十六至十八日，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访问香港时，香港警方不恰当对待香港媒体的表现一览无遗。

香港的一个电台许姓记者在采访李克强访港行程中，被香港警方强行接受不必要的保安检查。许姓记者指，警方在没有任何解释下检查她的银包，并将银包内的纸币以致乘搭交通工具的收据都逐一检查。

众多摄影记者、记者或摄影队都被阻止拍摄李的访问。香港电视台《Now》的薛姓摄影师八月十六日摄录李克强探访九龙蓝田丽港城住户时，遭一名不知名人士用手强行遮挡镜影机镜头，当记者追问该人士的身份时，在场的便衣探员却未有理会薛的投诉。



国际记者联会连同国际特赦（香港分会）及亚洲人权委员会在七月十二日发出联署声明，就记者及人权捍卫者被扣留表达关注。（图片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提供）

另一名《香港电台》陈姓记者亦投诉，当她在屋苑内试图拍摄李克强进入时，被一名女警务人遮挡、推阻及扣留。

李克强访港的行程中，香港媒体在其出席的多个公众活动中都被阻止采访，外国驻港的媒体更遭到不公平对待。一名驻港的日本媒体记者对本会表示，其它较著名的外国媒体记者可以出席李的公开场合，但是，他们则被港府以「地方有限」而被拒絶参与采访。一名不愿披露名字的记者谓：「是次的做法跟过去的完全不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甚至美国国务卿希拉莉访港时，我们都能够向他们近距离提问。再者，今次记者没有活动自由，我们不光要经过众多的安全检查，即使去洗手间，我们也被要求以小组形式安排，兼前后有一名保安员伴随。这做法真的荒谬！」

李的访问行程中，另一个扰人的事情是香港政府新闻处限制媒体报道的权利，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副总理李克强要求香港特别行政区首长曾荫权努力解决民生问题时，有关的录像片段却被香港政府新闻处删除，且未有纪录在新闻稿件上，发予媒体的影片及文字均曾经删剪。这情况同样发生在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身上，当记者问唐有关李克强访港时香港新闻自由受到压制，唐以「完全垃圾」作出否认。不过，「完全垃圾」四个字在政府发出的新闻稿上被删除。

除了香港媒体在李克强访港时受到限制外，香港大学三名学生及一名香港居民亦有同类经验，他们投诉香港警方滥用权力限制香港市民的权利。香港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就李克强访港时，香港警方的安排召开三次会议讨论。香港警务处长在会议上否认有任何政策要阻挡媒体，不过，当他解释一名电视台摄影师的摄录镜头被阻挡时，他谓因为「探员见到一个黑影，本能用手遮挡」，该名探员并不知晓有电视台摄影师提着一部摄录机。

国际记者联会代表胡丽云在会议上表达了，本会关注香港警方违反了香港警方通则第五条，未有协助电子媒体工作。同时间，本会自二００八年监察中国新闻自由以来，发现香港警方似采纳了中国大陆公安在敏感议题时会阻挡记者



本会代表胡丽云(左)与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图中) 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就警方在李克强访港时的安排，表达不满。（图片由立法会议员提供）

的做法；另外，亦分享了外国政府在同一情况下对待媒体的良好做法。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麦燕庭及总干事庄晓阳对香港警方的行动同表关注，且表示事件发生后，该会接获廿八起投诉香港警方的个案。

香港媒体经历了连串限制新闻自由的事件后，香港记者协会与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在八月廿日组织示威抗议，逾三百记者、新闻系学生及市民出席。九月十二日，两个会及一些独立记者发起穿上「我不是黑影」的黑衣行动，抗议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的「黑影论」。是次行动，本会更找到一些澳门、台湾及大陆的记者支持。

香港记者协会、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及香港新闻行政人员协会会见政务司前司长唐英年及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表达他们的关注。在会议后，官方答允会调查及跟进投诉的个案，不过，未有作出任何具体的承诺。

十月十二日，香港新政府总部又发生类似事件。香港特首曾荫权在新的立法会大楼发表新的施政报告，当他抵达立法会大楼门口时，多名记者、摄影记者及电视台摄录师被立法会的保安阻挡及熊抱，有些保安人员更阻记者进入一些区域，引致记者在立法会大楼内不再享有活动自由，可采访各立法会议员或政府官员。新立法会保安安排跟旧立法会大楼的做法南辕北辙，此外，更未有事前咨询媒体。媒体投诉后，立法会秘书长答允改善。根据香港各媒体报道，新的立法会大楼保安人数由过去的三十人增加一倍，个中原因却未见公布。

二０一一整年间，香港记者被粗暴干预及扣留的个案有递增之余，即使摘取信息也困难重重，那管香港政府于一九九五年设立公开信息守则。

香港警方未信守承诺公开透明

国际记者联会在二０一０年的年报中指出，香港警方在更改通讯系统数码化时，曾承诺



香港记者协会联同香港摄影记者协会就警方无理逮捕及指控记者举行游行示威，表达强烈不满。（图片由香港记者协会提供）



香港记者协会执委会约见香港警务处长曾伟雄及其它官员就记者被阻采访，递交廿八个记者投诉个案称，他们采访李克强时被警方无理阻挡，另外亦促请他们督促警员往后停止再阻碍记者采访。（图片由香港记者协会提供）



摄影记者在保安事务委员会聆讯时，因穿上示威字句的T恤被保安人员要求离开旧立法会大楼。（图片由《明报》提供）

会尽快向媒体公布发生的意外突发个案通知，可是，却未有信守履行。警方发出通知的种类包括盗窃、抢劫或求警协助，可是，案件若涉及非礼、强奸或勒索案则不包括在内。

据香港记者协会在二００九年七至十二月间进行的纪录，警方平均每天发出不足三起的突发事件通知，占警方接获总刑事案的百分之一点二七而已。香港记协更发现有时九天也没有一起消息通知，更难接受的是案件若涉及警方高层及社会名人，有关消息便不会被公开。

另方面，香港记协又发现即使警方公布消息但公布的时间一般都很迟，引致记者难于再前赴现场采访。自香港记协向警方投诉后，有关的通知便开始增加。不过，信息都是过于简单未能助媒体了解事件是否具有新闻价值，决定派记者前赴现场采访。香港警方则坚称，信息发放的速度及内容的细节并不是其主要的工作职务。

当香港警方持续地称尊重新闻自由，并强调在发放信息予媒体时有考虑政府公开信息守则。警方承诺会继续协助媒体，会适时发放信息予媒体，只要有关的做法未影响警方执行任务、侵犯个人隐私或影响司法程序。不过，有市民反驳警方的说法，认为信息拖延发放是致市民的安危于不理。

二月十三日，香港数份媒体揭露一间钟表公司被贼人入内爆窃后，香港警方才证实这起一周前发生的个案。可是，没有解释何以掩埋消息一周之久。可是，警方却有食髓知味，十月九日，警方再度没即使披露消息达一星期，意外更涉及人命安危。十月二至三日连续两天，香港将军澳区公众地方有四名人士在十二小时之内，各自遭不知名人士从后用刀刺伤；十月十一及十二日，四名位于观塘区的中学女生被一名长者先后非礼，可是，观塘区的警方既没有公布消息又没有解释。

「个人隐私」成借口拒透明化

多名香港立法会议员投诉警方置市民的安危不顾之余，且指他们乱用「隐私」做挡箭牌。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少光答允警方会改善运作，警务处处长亦谓会增加人手，回答媒体的查询。警务处事后偶尔竟可发放媒体通知达三百起之多。

可是，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在十月廿八日却否认警方刻意拖延向媒体发放信息。他指警方的职责是侦查案件，责任与媒体相同。不过，警方会召开会议以减少警方与媒体间的误解。

香港消防处及运输署亦同样用「隐私」作为盾牌阻媒体摘取信息。消防处七月份更改通讯系统数码化，媒体因而接收信息大量减少。

香港记协相信只要香港警方及消防处停止担任「守门员」或「采主」决定是否发放突发消息，问题便能够解决。香港记协强烈建议两政府部门改善信息发放运作，当删除苦主的个人数据后，立即将信息发予媒体，此举可纾缓警方筛选信息的忧虑。本会支持有关的建议。

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政府欲订立反缠绕法进行公开咨询，建议中违法者最高惩罚是罚款港币十万元（约美元一万三千）及监禁两年。不过，咨询文件并没有给予媒体有豁免权，解释指在其它已发展国家也没有让媒体有此权。香港记协非常忧虑媒体不获豁免将遏制调查性报道。

国际记者联会支持香港记协的观点及获悉台湾的检察院接纳了一个政策，容许媒体在调查公众关注的案件的前提下，可在现有的反缠绕法中获豁免起诉。本会呼吁香港政府在订立有关法例时，许予媒体有豁免权。

本会相信所有政府局级、部门及机构应立即全面履行政府订立的政府信息公开守则，以体现该守则目的是要求政府对公众负责任、透明化及公平。有关守则下，香港警方、消防及运输署都有公开信息，政府部门有责任发放信息，除一些影响公众安全或影响司法公正。香港申诉专员公署在二０一０年一月公布报告指，经调查后发现有些政府部门出现持续性对条款有误解及对有关守则的程序并不熟悉，故建议多个改善做法包括培训、确认政府部门的指引具有守则中要求信息清楚、准确及合时的准则。

国际记者联会二０一０年《敢言》中国新闻自由年报中，本会建议香港政府立即订立《信息自由法》及《档案法》让香港能够符合国际人权公约第十九条。政务司司长林瑞麟披露二０一一年四月至九月间，因政府总部的搬迁，有三百五十万张纸的政府档案被销毁，四十六个政府部门中，只有十一个把秘密档案交予政府档案处，而保安局在二００六年至二０一０年更只给予档案处四十二个档案。这些数据令本会感到极度失望。

本会相信订立《信息自由法》及《档案法》是建立一个负责及民主政府的重要一环，与此同时，本会促请香港特首要求所有政府局级、部门及机构，特别是保安局遵守现时存在公开信息守则。同时间，香港警方及消防处可考虑采纳其它一些国家每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信息。



香港政府近年间经常以吹风会交待政府政策，替代应有的正式记者会。有关做法引起业界、学术界及政界强烈不满。（图片由胡丽云提供）

吹风会

二０一一年，香港政府懒理香港记者协会二０一０年官方杂志《记者之声》的揭露，仍然常用「吹风会」传递信息。

香港记者协会曾就此跟政府新闻处处长黄伟纶会面，黄响应指记者会及背景催风会各自性质不同，政府官员会用不同方法向公众公布政府不同的政策，不过，他亦同意记者会是惯常兼全面的方法向公众公布及解释政府政策的方法。

在众多「吹风会」中，其中一项为人熟悉的政府决议是一次过派发六千元港币给香港成年居民，六月十六日，政府官员闭门向媒体交待有关六千元申请的方法等，并非召开记者会公开交待。

再者，记者报道这类消息时，会被要求以「政府发言人」取代政府官员的真实名字及职位。

十一月廿三日，香港民主党立法会议员刘慧卿动议促请香港政府捍卫新闻自由，当中包括要求政府公开所有活动予媒体采访、停止限制媒体及调查《亚洲电视》行政人员是否干预新闻部，动议虽得到泛民议员支持，但最终仍未能通过。

本会相信香港政府已良久把这重要的议题置诸高阁，《信息自由法》及《档案法》都是重要的要素，确保一个更巩固民主、问责及公开透明的政府，这正是香港政府制定政策的目标。

无公共广播经验公仆任广播服务要位

香港政府部门之一的香港电台二０一一年亦受到「重创」。九月九日，监管香港电台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公布委任劳工及福利局副秘书长邓忍光出任广播处处长，不管邓在媒体界毫无经验。

一九八七年便加入政府公务员队伍的邓忍光。据香港《星岛日报》报道指，政府接获廿六名申请者申请出任广播处长一职，但竟无一人合适，邓随后却获委任。邓是政府新闻处处长黄伟纶的同学。

邓获任后，随即引起各方评论包括广播处前任处长黄华骐、香港电台职工会、学者及议员。香港电台制作人员工会主席麦丽贞形容邓的委任，是公共广播的「黑暗一天」。她指：「邓忍光毫无公共广播经验，他的委任显示香港政府进一步干涉香港电台的编辑自主。」

邓忍光被记者提问如何捍卫香港电台的编辑自主及辨识政府蹼喉舌时，他只再三覆述谓，会遵守香港电台工作守则。在其上任的首天，香港电台制作人员工会及其它关注新闻自由的组织以黑色地毯「迎接」抗议。

香港电台制作人员职工会争取香港电台独立于政府部门良久，不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在二００九年却反对港台独立，委任邓忍光更引起违反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呼吁政府控制的媒体该转为独立公共广播服务。

二００九年的检讨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除订立一个约章外，更成立一个最多十五名委员的委员会就不同议题给予广播处处长意见，当中包括编采政策及节目标准。同时间公布，香港电台拥有自己的电视台及数码化广播。



香港政府委任公务员邓忍光出任广播处处长后，引起香港电台工会强烈不满，以黑地毯迎接其首天上班，以示不满。（图片由《明报》提供）



吴志森(图左)及周融(图右)突然被通知不再获港台续约，因为社会极度关心港台是否受到政治压力。（图片由《明报》提供）

正当邓忍光的委任成为城中热门话题，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常任秘书长（通讯及科技）谢曼怡解释，委任邓是因为廿六名申请人中找不到一名合适人选，同时间，港台数码化广播需尽快推行。

国际记者联会明白推行数码化广播的急迫性，不过，认为香港政府应尊重新闻自由。本会呼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立即再开展新任处长的招募及接纳港台工会的建议接纳内部晋升。

自邓委任后，港台便立即卷起自我审查的争议。十一月廿二日，两名电台的主持人吴志森及周融被知会二０一二年不再获续约，因为二人负责的PHONE-IN节目进行改革。两节目往后各自由一名主持人负责，不过，其中一名主持人却是公务员。有关改动引起媒体、学者、时事评论员及议员批评，忧虑有关变动是受到政治压力，可是，香港电台发言人却予以否认。香港电台商议节目改革已为时一年，在二０一一年五月完成，吴于七月获续约。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会在十二月十二日的会议中，要求广播处处长邓忍光、公共事务组中文节目节目总监梁家永、吴志森及周融出席会议，席上，邓否认有任何政治施压。

香港电台一月份已涉及自我审查的风波。著名争取民主运动的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病逝，香港电台本安排在其安息礼拜上进行现场直播，不过，有关安排却突然终止，港台工会致函予当时出任广播处处长黄华骐解释，不过，黄未有直接解释，但承认司徒华去逝的消息具新闻价值，港台亦已进行全面的报道。他又谓，港台的官方网站亦已提供一个主办安息礼拜的负责单位的超级链接让公众收看。

港台工会主席麦丽贞指，有关安排的取消为港台的独立性增添疑问。她指，港台的管理层置港台的编辑自主于危夕，现场直播的取消抵触过去惯常的做法，她已二００九年东亚运动会为例，当时港台也有直播火炬的传送，即使主办单位也提供直播服务。

一天后，时任置任广播处长梁松泰否认有关做法是受到政府压力。他指，编辑方针是由港台职工自行决定，无人能够干预。他又谓，取消节目的决定是一个集体的决定。麦质疑有关说法，她指决定倘若是「集体」，港台管理层更需认真检视自己的决策是否已受到政治干预。

《亚洲电视台》管理层干预

二０一一年九月五日，《亚洲电视》突然公布高级副总裁（新闻及公共事务部）梁家荣辞职。梁跟《亚洲电视》新闻部职工表示，「我用尽快最大努力都不能阻止（中国前国家主席江泽



新闻主管梁家荣(图右) 确认因用尽努力仍阻止不了错误消息广播，故愿意承担全部责任，九月五日，《亚洲电视》突然宣布梁辞职。谭卫儿(图左)期后亦递交辞职信。（图片由《明报》提供）

民未经证实的死讯）出街。」梁的辞职信息传出后，他的同事谭卫儿向管理层亦递交辞职信，不过，出任电视台副总裁的谭三天后被公司要求暂停职务，直至另行通知。梁家荣离开电视台的信息立即引起社会热烈讨论，担忧高级管理层干预新闻部。

事端源于七月六日，《亚洲电视台》是首间媒体确认一直盛传八十四岁的江泽民已离逝的信息。电视台且在消息公布后，把台徽的颜色由橙红变为黑色。不过，已安排关于江泽民的纪念特备节目却在当晚突然取消。翌日，中国政府操控的媒体《新华社》否认有关信息，并指信息纯粹谣言。《亚洲电视台》往后才作出道歉声明。当记者就有关消息误报追问电视台的核心人物王征时，他谓「这些事在香港难以避免，作为同行，大家无须反应过敏。」

同时间，众多报纸报道称梁为消息的误报，负上全部责任。不过，梁的请辞并未释除民间的猜测，社会普遍相信消息来源是来自于电视台更高层，更有人猜疑消息来源者是王征。

在中国大陆从事地产业务的王征在二０一０年三月染指《亚洲电视台》，他向《亚洲电视台》主要大股东查氏兄弟购买大量可换股债券，王之后更向外界声称自己是电视台的最大股东。在记者会公布消息时，王征更谓希望《亚洲电视台》可以成为亚洲的CNN。自始，王征积极参与电视台的活动，不过，另一名股东台湾富商蔡衍明质疑王购买债券的合法性。蔡、查氏兄弟及王征之后卷起漫长的法律诉讼。往后，王自称是《亚洲电视台》的义工。

二０一０年九月，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公布接纳了香港上市的地产公司黄炳均的申请，成为电视台的最大股东，占有电视台百分之五十二点四的具投票权的股份。有媒体报道指，黄与王有亲戚关系。

自从失实消息报道后，广管局接到数十起投诉《亚洲电视台》的个案，于是展开调查。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在九月十九日召开会议讨论，调查电视台行政管理层是否干预新闻部的独立，电视台又是否违反牌照条款。会议上，梁拒絶披露消息来源者，不过，他承认并不相信消息来源，他个人亦多次核实消息的真实



大陆商人王征昔日公开宣布购入《亚洲电视台》的可换股债券后，雄心壮志地表示要把《亚洲电视台》打造成亚洲的CNN。

性。梁被多问立法会议员追问消息来源者后，他说：「由于我容许消息广播，我应该负起全责，即使用枝枪对着我的头，我也不会讲是谁。」数天后，梁接受《商业电台》访问，他称在失实的消息广播后，他发现台徽的颜色更变了，他没有职权转变代表整个台的台徽颜色。虽然，他未有交待谁掌握该权，但一般而言，该权力属于电视台的拥有人。

在立法会会议上，梁家荣承认对公司有迹象拥有有偿新闻而感到愤怒。梁称，自七月八日，有偿新闻的迹象似越来越明显。不过，他未有进一步交待谁人。

一名不愿公报名字的记者说：「我们知道七月八日左右，梁喝停了一起新闻因为该新闻来自一个收费节目。该节目主持人试图把该则新闻插入早上的新闻时段报道。有关做法，事前未有通知梁。」另一名记者又谓，该收费节目五月开始，每十分钟收费约三十万港元。

八月份，《亚洲电视》召开公司大会，公司管理层鼓励所有雇员都成为项目经理。一名记者对本会谓：「我不记得是谁讲，不过，那人讲若果我们能够达到营销目标，我们可以取得最高的百分之二十的分红。管理层并没有进一步阐释是否包括新闻部。我们听后感到愕然，因为这个说法就好似接受有偿新闻。梁家荣即场异议。」

另一名记者又对本会透露，《亚洲电视台》新闻采访纪录簿采访类别有三种。她说：「第一种是一般采访，第二种是有三粒星，这类别代表若人手不足时可以不去；第三种是有五粒星，即代表我们一定要派人去。有星的采访类别，很多时都是跟大陆商人或政府官员有关。」

她再进一步讲「这些采访通常无甚新闻采访价值，很多时似是公关活动。我们很少报道有关消息。有摄录师向我投诉，这些活动很多时都似私人聚会，他们很多时都要听从参与者或主办者的指示拍摄。这些采访活动都好麻烦，我们就好似为了满足某些人自己的需要。」

自梁及谭的请辞公布后，电视台新闻部的士气低落，所有新闻工作都穿上黑色的衣服并撰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管理层交待有关疑团。不过，管理层并没响应，新的新闻部负责人更建议低调处理香港民主党在《亚洲电视台》门口抗议的新闻。谭卫儿九月七日与记者开会后，不禁说出：「大家知道被人干预系辛苦。」一天后，她便突然被要求停职。

立法会信息科技及广播事务委员会九月十九日的会议上，《亚洲电视台》派遣两名管理层出席，随行更有两名律师陪同。他们均否认对新闻部有任何干扰或有任何的有偿新闻。媒体组织、学者及立法会议员都并不相信。香港民主党副主席刘慧卿要求委员会再召开另一次会议，许予所有出席者有特权豁免因自己的证言而有任何的法律责任，刘的建议虽然得到泛民主派的议员支持，但最终仍未能通过。

虽然，会议未能查出谁人干扰新闻部，两名出席会议的管理层却三番四次否认有公司行政管理人员干预新闻部或准有偿新闻。他们披露大陆地产投资者王征已成为电视台董事局盛品儒的私人顾问，王更曾代表盛出席数次董事局会议。董事局另一名董事胡竟英，获蔡衍明的支持向委员会递交声明指，自从王征参与《亚洲电视台》后，董事局一直没有正式的会议召开。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随后就梁家荣请辞的相关事情召开独立调查，查证后确定高级副总裁邝凯迎两度向梁及谭作出立即广播的要求。《亚洲电视台》因广播失实报道，抵触节目广播实务守则被罚港币三十万元（约美元三万八千）另外，两个财经节目同样违反守则，不过，电视台只须接受警告。广管局主席何沛谦称，《亚洲电视台》管理层在调查事件上没有采取合作态度，不负责任之余，更未有提供充足证据以助调查。何又指邝凯迎被问及失实消息的导致原因时，更给予前后不一的证词。

广管局表示，仍会调查《亚洲电视台》的管理层命，电视台的命运仍悬而未决，但是，电视台的拥有权仍卷入多起的官司中。王征、查氏兄弟及蔡衍明就拥有电视台的股份仍有数起官司等候开庭，蔡在十月更入禀香港高等法院要求申请《亚洲电视台》清盘。据香港《明报》十月廿九日报道指，《亚洲电视台》董事盛品儒称，电视台已给蔡的公司二千三百万港元清付债务。

媒体的最主要收入来源来自广告，广告商的权力在新闻部更见拓张。

香港地铁意图操控媒体

四月十九日，香港政府有部份股权的香港地铁公司的广告代理顾问公司（OMD）意图「惩罚」媒体。该公司向十九间香港媒体发信指，香港地铁保留「取消或重置任何媒体广告安排」的权利，惩罚报道影响地铁公司名声的负面报道，当中还包括地铁在其它市场的路轨事件。该顾问公司又要求媒体「有关警告清楚地与公司内部职工包括负责采访运输新闻的记者及编辑沟通。」

信函的出现源于香港《明报》报道批评香港地铁公司将军澳的地产发展项目，旁边则刊登地铁公司的广告。

香港地铁公司及该顾问公司在信函曝光后，立即就此事作出道歉。地铁的置理行政总裁表示，「我们向公众引致的误解表示歉意。我们尊重新闻自由及从没有意图干涉新闻自由。」

地铁将此事推诿在顾问公司，指称该公司误解地铁公司的指示，信件亦最终撤回。该顾问公司逾七年时间为地铁提供服务，地铁的最大股东是香港政府，香港政府对此事拒予响应。

新一轮的国安法威胁

香港特首曾荫权的任期将于二０一二年六月底届满。新一轮的特首选举将于二０一二年三月举行。全国人大常委范徐丽泰已表明，下任特首需要订立《基本法》廿三条国家安全法。当香港媒体追问两名竞逐特首的候选人唐英年及梁振英时，他们一旦出任特首时，会否在自己的五年任期中订立廿三条，他们都不断重复香港有宪法性责任立法。《基本法》廿三条针对叛国、颠覆国家政权、煽动暴乱、分裂国家及泄露国家秘密的罪行而订立，对表达自由造成沉重的威胁。澳门特别行政区于二００九年已订立廿三条。

香港记者协会呼吁下任特首力拒订立有关法例，记协相信有关法例并无急迫性需要订立，现有的法例已足够包括廿三条中所针对的问题。不过，香港政府若要立法，便需要给予足够的保护网保障新闻自由及表达自由，最基本的标准便是采纳约翰内斯堡有关国家安全法的原则，保障表达自由及摘取信息自由，让公众利益及出版得到捍卫。

国际记者联会支持香港记者协会的呼吁，本会促请香港政府考虑修订现有的法律，而无须另行再订立同一功能的新法。同时间，本会相信香港政府有宪法性的责任捍卫新闻自由，有关自由已订立在《基本法》第三章第廿七条，因此，香港政府应先订立《信息自由法》，才考虑《基本法》廿三条，以确保市民的知情权不致褫夺。

香港记者大陆采访受滋扰

当香港记者在香港采访受到九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滋扰，他们在大陆采访亦难于享受到采访自由或行动自由。自北非茉莉花二０一０年底发生后，这股风迅即吹送到中国大陆，二０一一年二月二十及廿七日在北京、上海及广州便出现两次抗议活动，香港记者采访时被便被不知名人士阻挠，记者都相信他们是公安。

在采访政协及人大会议时，多名香港记者亦遇到各项滋扰。据《苹果日报》报道指，有记者投诉放在酒店的计算机被人开启，行李亦被搜过，此外，报道更指他们被远距离监控。国际记者联会虽然无法证实有关投诉，但本会获悉记者用手提电话讲话时，若提及「中国茉莉花革命」时，信息便实时终断。



澳门新闻局局长陈志平不断覆述，澳门政府不会插手传媒界自行组成的新闻评议会，　但是，他却拒絶部份业界的建议，索性在修订的法例中把新闻评议会的法订定会删除。（图片由胡丽云提供）

十二月十八日，多名记者包括香港《有线电视台》林建诚与三名同事，日本放送协会电视台三名记者前赴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采访时，被公安、省宣传部及外宣部包围，以「安全」为由强求记者离开。林指，当他在食肆内写完稿件后便遭五至六名便衣人员阻挡，他们指乌坎村「有内部矛盾」及「保护人身安全」而要求记者离开。虽然，林指个人并未感受到安全威胁，最终在多人护送下离开乌坎村。

澳门媒体受到威胁

五月一日，百名澳门市民在国际劳动日抗议，澳门记者前赴采访时遭澳门治安警阻挠。据澳门媒体报道指，记者用相机或摄录机拍摄治安警抬走示威者时，被治安警阻挡按着。多名记者期间更受伤。治安警解释他们有责任在示威中保护记者安全。

六月廿二日，澳门广播电视台编辑曹永贤称收到两封恐吓信，威胁他不能再报道电视台内部的事情。澳门电视台获政府资助，不过，电视台被受批评欠缺编辑自主。

二 0 一一年底，澳门政府更进一步对新闻自由添加威胁。

自澳门特首崔世安获委任后不久，他称要修订澳门的《出版法》及《广播视听法》。政府期后委托一间独立的顾问公司在业内及公众进行咨询，但是，媒体界对法例修订建议的目的存疑。

十二月三日，一群记者鼓励同业杯葛有关咨询，质疑法例修订的需要性及咨询过程。一名澳门记者对本会谓，不满于政府并未先向业界查询便公布法例的修订，与此同时，对于咨询只进行一天，且获邀咨询的记者也要事先被筛选而并不是整体业界。据媒体报道，十二月四日的咨询日，只有廿九名记者参与咨询。

根据现行的《出版法》，法订的新闻评议会需要成立，该会有权接受公众投诉；此外，多名澳门记者对于重置记者证制度表示质疑。不过，多名担忧若有关制度设定，将对敢言的记者造成威胁。有记者担心政府会向新闻评议会施压致摧毁记者的公信力。澳门新闻局局长陈志平多次重复，澳门政府无意向是否成立新闻评议会，他指，政府希望该评议会由业界自行成立，不过，记者及澳门议员质疑其说话的可信性。澳门大部份媒体都是获得政府资助，故令人担忧政府或在其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促成新闻评议会的成立。

新闻自由已不再自由？

程淑贤

本人一直以为只有内地媒体要听命于党、听命于单位，谁知听香港一位前辈的真人真事，竟吓了一跳！正沉思香港媒体现阶段的困局之际，碰巧在七月六日发生亚洲电视晚间新闻错报国家前领导人江泽民逝世一事，引发香港社会不断追问已请辞的亚洲电视前新闻部高级副总裁梁家荣，究竟他是否遭受某些上级干预其编辑自主，导致新闻未经官方渠道证实便要报道出来？抑或有更高于该电视台拥有者的政治力量，向新闻部编采人员施加压力？若如是，那岂不是动摇了香港普罗市民坚信的核心价值：新闻自由已不再自由？

当一众香港立法会议员在传媒镁光灯前质问梁家荣，有没有受到任何上级干预，导致错报事件发生？坦白说，「尊贵」的立法会议员已为选他们入立法会的选民以至支持者，交足了戏。然而，他们的问题，就是寻常百姓亦早已明白：不需要问，因为问题是永远没有答案的。答案是早已在每天各报章剪裁的新闻角度上清晰可辨。

当报章的老板是人大政协之流，董事会成员自不乏政经界翘楚，或已获特区政府颁授勋章的杰出商家，你认为编采部门真的有独立自主这回事吗？你认为中央处事失当、特区政府行事无义，这些媒体的老板会敢于着下属「是其是、非其非」吗？

前辈告知，任职报馆管理层绝对可以自身的体验出发，验证香港传媒企管中人的悲凉：要讲新闻良心、大道理，谁不晓得；问题是在于坐镇媒体的大当家，不都要向老板负责吗？当媒体老板将其它政治因素或商业利益，凌驾于言论自由、新闻操守之上，那么大当家可以怎样？ 尊重新闻有其第四权的社会功能，监察政府施政得失的责任，绝非一个媒体的大当家紧守新闻原则便可了得。

惯弯腰听令 奉迎主子

当一个媒体的老板公器私用，视媒体为一种方便向中央政权示爱、向自己隶属的党团效忠的私人工具，试问媒体的管理者、各级主管以至前线工作人员，还能够怎样？ 而当一个媒体的老板曲意奉迎北大人，媒体内上上下下自然会形成一种文化，一种在政治取态上左倾的文化，一种唯老板旨意是从的封建皇朝奴才文化，媒体监察政府施政的功能已然荡然无存。

前辈当日有份参与革新一份亲建制、悄然左倾的报章，最大的挑战是：老板习惯弯腰听令之后，一下子要他稍为挺直腰板，难。要报章内的主管以至前线工作人员，放弃「揣摸朕上」、「奉迎主子」的工作态度，更是难上加难。当后者习惯以服侍帝王的奴才心态出发，新闻素材一旦触及与老板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事件或人物，例必格外重视；遇上疑似老板的友好，或疑似老板戮力讨好的富豪政要新闻时，便会大吹大擂，将公器变成主子擦鞋的毛刷；碰上这些尊贵人士有任何负面新闻，编采部人员例必自动将之技术处理，淡化或甚至取消而不予刊登。此之谓「识做识趣」。更可怕的是，编采部新闻从业员因要「奉迎主子」，甚至主动为某些人士开设专栏特写，将之奉为神明。

惊电胆风波 中联办喝停

前辈当年获许诺可强政励治，一洗企业多年积习的酱缸文化；遂鼓起勇气，卷起衣

袖，图力挽狂澜。可是，最刻骨铭心的痛，是领会了一个亘古的道理：奴才哈腰拜见惯了，误会自己是未进化的猿人，敌视人憎恨兽；看见人，便骂他不懂求生之道；看见兽，便马上披上衣裳，挺直腰板，以示高人一等，夸夸其谈。奴才的庐山真面目，不易见。只有关键时刻，他，才会原形毕露。

远的不说，就说2009年特首曾荫权发表施政报告，当中提及一项惠及普罗大众的新猷：赠送慳电胆券。报告一出，曾特首遭媒体揭露，其儿媳莫蔚淇的父亲之家族生意，原来正是经营慳电胆的飞利浦品牌本港主要代理商，于是曾特首马上惹来「利益输送、益亲家」的嫌疑。舆论一致狠批。前辈主理的报章也不例外，岂料批评曾特首的报道出街当天，老板来电训令，要收势，原因是：中联办那边开声了。不看曾面看中面。

「不是部级的，干吗你要理他？」

老板着重中联办的看法又一例证。前辈有次接到某带话人电邮，忆述日间与老板会面之际，知悉他收到中联办电话，投诉中国版内竟然刊出一则新闻，内容大意是指中国境内人权状况是全球最差。某带话人建议以后最好不要刊出此类信息，以免令老板尴尬。

据前辈说，近年最夸张干预其编辑自主的，可算是2010年五区公投事件。立法会补选当晚，他先后收到来自新闻处、中联办及老板的电话。新闻处代表政府立场，希望前辈报社社评中可以批评公投是如何浪费纳税人的金钱。中联办则着前辈狠批公投是政治不正确的，应该被唾弃。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老板最初问 ：「是那一个向你传话？甚么级别的？我要给面子的话，亦要看那是谁！不是部级的，干吗你要理他？」不消一小时，当他记起有朋友牵涉其中，又凶巴巴的致电前辈质询，问知否某某「是我的甚么人」？充当投资传媒的生意人，利用公器作为取悦中央的工具，我们可以理解那是小民的意识：民不与官斗。可是将传媒公器变成招呼友侪的宣传品，试问传媒的公信力还在吗？经营新闻媒体的投资者，其实有没有认清此一业务的特质，与贩卖漫画书有别？

中国的互联网状况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讯化部公布，中国的网民在二０一一年已近五亿用户。不过，换来的是，中国领导层视互联网为民间最具影响力的传讯工具，因而投资重大资源监管网络世界。

自从二０一０年中东及北非茉莉花事件暴发后，推翻了多名的专政领袖，因而引起中国中央政府的紧张密切留意。茉莉花的香气终散播到中国境内，可是，换来的是众多维权人士被扣留、检控、惩罚或虐待。同时间，中央政府亦决心加强巩固网络监管的制度，强调「公众舆论引导」的工作。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中宣部副部长王晨曾至少五次提及「公众舆论引导」，虽然，话中并未述明那些媒体，不过，彼此都明了媒体泛指媒体与互联网。媒体现时已受到多个官方机构严控，当中包括不同层级的宣传部、中国新闻出版总署、中国国家广电总局。至于互联网亦同样受到不同部门监管包括各层级的宣传部、中国工业及信讯化部、中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及公安部。再者，中国中央政府亦鼓励业界自行组织自我监管的社团。

二０一一年，中国中央政府在上述提及的众多监管部门上，建议新增一个统管互联网的机构。五月份，国务院内增设一个名为国家因特网信讯办公室，加强统筹政府内各监管互联网部门的联系，不过，有评论指办公室的成立目的是进一步审查互联网。办公室的副主任由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而中宣部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委员王晨则出任办公室主任。

虽然，中国政府成立办公室的真正目的未见清晰，但是，众多维权人士、学者及媒体工作者都相信新办公室的成立，「中国茉莉花革命」是主要导火线。

二月十九日，美国注册的网站《博讯》在网上发布了一则二月廿日「中国茉莉花革命」在北京、上海及广州示威抗议的讯息后，有关讯息只有数小时的「寿命」，之后，没有人再能登陆有关网站。倘若有网站讨论区、博客或社交网刊登有关讯息都会被封，与此同时，众多与之相关的词都成为敏感词包括「茉莉花」、建议其中一个示威场地的北京王府井，这些字都不能上载。此外，众多网民登陆的讨论区亦上载了一则警告字句说明「禁止用互联网进行非法活动」。网民亦被警告不能组织、散播及煽动示威及抗议，否则会视作抵触中国法例及宪法。

社交网

二０一一年的社交网微博的发展，不独成为传统媒体追寻新闻的源头，亦迅速引起官方关注内里提及的活动。自年初，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系教授于建嵘便利用自己的微博鼓励民众，用自己的手提电话摄下街上行乞的小童，打击中国掳卖儿童的问题。有关呼吁迅速在中国全国散播，同时间亦给予公安重大压力因为自一孩政策实施后，中国境内掳卖儿童的事情令公安感到困扰。最终，有数名被掳的儿童更因此行动的呼吁成功返回父母的怀里。

这些活动并未给予中央政府制造严重的问题，直至两宗涉及慈善组织的事件发生。二０一一年六月，一名自称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的女子在自己的微博中，炫耀自己的富裕生活包括展示多张名牌汽车、珠窦首饰及手表的相。两个月后，另一名女士自称是全球华商未来领袖俱乐部秘书长。虽然，自称是红十字会职工的女子最终供认自己蔑造有关名衔，但是，另一名自称是秘书长的女士，则被网民揭露她父亲既富有之余，且与众多公益社团有联系。网民在两个案中，曝露了现时公益社团未有公布公众捐款的去

向，有关制度欠缺透明度之余，亦发现社团的管理混乱，民政部监管不足。

《京华时报》八月廿六日报道指，两个案曝光后，民众的捐款锐减，二０一一年三至五月间接获的捐款总额为六十多亿人民币（九亿多美元），但两事件后，只收到八亿多人民币（一亿多美元）。

当微博的影响性展现后，网上各微博便出现了一个「辟谣联盟」，不少维权人士及学者都相信这个想法是来自官方。虽然，没有证据证明有关说法，但是，自国家因特网信讯办公室成立后，办公室主任王晨至少两度提醒所有网站的管理人及共产党员要加强微博及实时讯息发布工具的管理。

据多个微博消息指，王晨要求互联网公司除了加强管理技巧外，还要做好舆论导引。王晨的说话，随后获三十九家网站公司包括中国电讯、中国联通、新浪、腾讯、搜狐、百度及新华等响应同意加强审查。

十月三十一日，王晨跟广东省政府官员会面时，再度提醒他们所有官员要「占领微博」。他谓，宣传部的官员有责任澄清网上谣言及传播官方政策。

持续网上审查

国际记者联会相信互联网在华人社会里已经是一个方便的沟通工具，它更成为公众交换不同意见的重要渠道。微博不只制造多元化社会，更提供不少念头与政府提供其施政政策。中国政府明白它在民间已是一个有效及快速散播政策及澄清误解的平台，所有，要求所有政府官员在推行政务时要有「占领微博」。不过，国际记者联会相信民众有能力辨别讯息的真伪，政府无必要在现有众多政府部门及网上人员监视互联网之际，再斥资源设立新的监管部门。

据《新华社》九月一日的报道指，国家因特网信讯办公室及中国工业和信讯化部连手在二０一一年四月便关闭了六千六百个非法网站，不过，报道未有交待「非法」的定义或涉及的网站的内容。可是，中国互联网协会早已让业界签下自我监管的同意书。

自二０一０年，最大的搜寻工具「谷歌」把搜寻工具的运作由中国迁往香港，不过，这并不代表「谷歌」可免于黑客攻击。六月二日，谷歌公布一些中国籍的维权人士的个人电邮信箱及美国的政府官员遭到攻击。

有关的攻击是钓鱼式的做法，攻击发自中国济南。有关的攻击是有组织包括专门制作一个电邮发予数以百计的人士，令人看罢电邮俨如来自一个认识的朋友，但是，每个电邮都是虚假的，目的是令收件不虞有诈把密码输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亦作出回应谓：「黑客是全球各国问题，中国也是其中一名受害者。那些声称中国支持黑客的说服完全揑造及别有用心。」

另方面，个人若涉及一些敏感的议题尤其涉及新疆及西藏，在互联网上遇到众多困难。五月，一名内蒙古自治区牧民因阻止矿务工程车驶进其土地而被车辆辗毙，当地事后发生连日的示威行动，没有一个人在该时段能够发放讯息。据一个关注蒙古南部的人权讯息中心指，所有网站的讨论区都以「维修」为由关掉了。

这情况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同样出现。七月三十及三十一日，喀什连续两天发生血案，造成十人死亡，其中八人更是被公安开枪射杀；此外，再有四十人包括公安受伤。据《新华社》及新疆政府控制的《天山网》八月一日报道指，五名人士被公安指为恐怖分子而被射杀。可是，读者看罢有关报道后，仍未能理解事件及无人能够把自己个人对事件的看法在互联网上散播。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谓，自二０一一年三月，新疆有十二名西藏喇嘛自焚死亡。不过，没有人知晓事件跟宗教自由是否有关。这些事件难于在中国媒体中报道。中国大陆的时事评论员张平对本会谓：「中国官方对媒体有一个规则，他们若报道西藏的议题就会有麻烦，因为西藏任何议题如自治、宗教、军事及爱国主义等问题，姑勿论你谈那个议题，中国官方都会认为你有问题，并会对你讲「你不对」。」张平曾是《南方周末》副总编辑，但二００八北京奥运年时，被降职成为集团的高级研究员，因为他为英国的《金融时报》中文网站撰写了一篇西藏三月骚乱事件的文章。

本会建议

（一） 中国中央政府下达命令立即释放被囚禁的新闻工作者，饬令各省市及直辖区政府立即释放因履行职务及为公众利益而撰文的被囚记者及作家。

（二） 中央政府下令停止所有专制及无理终止聘用、惩罚及拘禁记者的行为。有关媒体应该立即准许记者复职。

（三） 中央政府该成立一个独立组织全面彻查新闻界内，所有中国境内外的记者曾遭遇暴力包括有政府人员背后指示的个案。中央政府确保独立的组织包括前线的新闻工作、学者及全国记者协会的代表，使违法者绳之以法，让各方明白社会不能容忍袭击媒体。

（四） 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的执法人员停止乱用法例威吓及使记者消音。

（五） 中央政府下令各级政府的公职人员及公安停止阻挠、滋扰及惩处记者、新闻助理、辅助采访人士包括雇用的司机、消息来源者及被访者；同样，不准损毁或充公新闻材料。

（六） 中央政府确保各级政府人员全面履行奥运后，中央政府延续奥运时许予外国记者在中国境内的采访权。中央政府确保各级政府人员履行二００八年十月奥运时的规定，记者在中国境内可自由前赴不同地方进行采访活动。

（七） 中央政府应下令各级政府官员确保所有记者，记者助理行动自由，及自由采访，毫无箍制。

（八） 中央政府应下令所有处理入境政策的官员执行国际间接纳的良好做法，让外国记者包括自雇特约记者申请护照时，涉及的相关程序是一致、及时与透明。

（九） 中央政府下令有关部门终止二零零九年香港及澳门记者往内地采访时，须要申请准许证的制度，让记者能继续在中国境内采访不致受到任何干扰。

（十） 中央政府应下令终止记者黑名单制度。

（十一）中央政府应终止所有针对互联网审查的规例及命令。

（十二）中央政府应下令终止限制互联网或转载互联网讯息的指令。

（十三）中央政府应下令各省市政府不能在公众关注的事件上，操控本区或全国的通讯系统或任何时段中断通讯系统，影响民众摘取讯息。

香港特别行政区

（一） 香港政府应订立《信息自由法》及《档案法》展示政府的问责性及具透明。。

（二） 香港政府应指示所有政府部门遵守公开信息守则。

（三） 香港政府应指示所有政策局、部门或机构高举新闻自由，尤其是政府正考虑立法制约缠扰行为。

（四） 香港政府需指示香港警方及消防处信守承诺及时发播讯息予媒体，并履行过往行之有效的惯例。

（五） 香港政府应高举《基本法》第三十七条所订人民享有的知情权及新闻自由，指示所有政府人员以正式的记者会发布讯息取缔闭门的吹风会。

（六） 香港政府应撤换政府公务员出任广播处处长及《香港电台》的总编辑。

（七） 香港广播事务管理局应调查《亚洲电视》高级管理人员是否违反实务守则，危害新闻自由，并公开发布调查报告。

（八） 香港特首应主动与中央政府展开对话撤销限制香港媒体在中国的采访。

（九） 成立一个保密及独立的投诉局，处理曾经历压制新闻自由的记者投诉。



Visit asiapacific.ifj.org or www.ifj.org for more information.

The IFJ is a non-governmental, non-profit organisation that promotes coordinated international action to defend press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strong, free and independent trade unions of journalists. IFJ Asia-Pacific coordinates IFJ activities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IFJ works closely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particularly UNESCO,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mmission, WIPO and the ILO, 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ouncil for Europe and with a range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ion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organisations. The IFJ mandate covers both professional and industrial interests of journalists